最新法院执行工作全书

经典案例篇 (十八)

本书编写组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新法院执行工作全书/本书编写组编. —呼和
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

ISBN 7-204-05942-5

. 最... . 本... . 法院 - 工作 - 中国 - 资料
. D9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4937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010010)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60.25 字数: 4 000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书号: ISBN 7-204-05942-5/D·120

定价: 1920.00 元(本卷定价: 16.00 元)

目 录

接受人大监督促进司法公正高效	1
管理强院人才兴院形象树院	10
提高司法效能树立公正形象	16
对基层法院化解社会矛盾的思考	18
以司法为民为宗旨促审判工作上台阶	29
抓住机遇努力创建“三型”法院	31
传媒与司法：宪法性权力(利)的冲突与界定	40
关于对旁听、采访自由与公正审判的界线	42
报道自由、评论自由与公正审判的界线	44
电子证据是净化网络利器	46
对人民法院纪检监察工作的几点思考	49
对加强审判委员会建设的几点思考	57
对司法为民思想的法理学思考——从董必武 人民司法思想谈起	63
当庭宣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92
裁判文书引用法条的实务与思考	97
对新时期法院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112
程序公正的价值研究	123
对建立我国判例指导制度之思考	134
初探司法警察职业化建设	142
“春秋决狱”中的合理性与司法理念的本土化	150

对案件审理周期的理解和影响案件审理周期的原因	159
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条文全文的探索与思考	168
当前送达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94

接受人大监督促进司法公正高效

人民法院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这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人民法院应尽的宪法义务。加强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增强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完善接受监督的措施，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不断加强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有效地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一、切实加强领导，统一思想认识，增强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意识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人民法院的监督，不仅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权力机关的重要职责，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不可替代性，而且是人民法院不断改进审判工作，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为统一思想认识，院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不论是在工作部署上，全市法院工作会议上，还是在个案监督的办理中，都反复强调人大监督的法定性、重要性和必要性，使两级法院领导及法官充分认识到：

第一，人大的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是

代表人民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人民法院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有充分的宪法、法律和法规为依据。

第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有利于发现人民法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切实改进人民法院工作。在现阶段法官行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够完善，法官素质还有差距，执法环境还不够顺畅，客观上还存在执法不公、不严、不快、不廉，特别是针对全市法院队伍建设的现状，强化外部的监督，更加有利于改进人民法院工作。从实质意义上说，监督就是支持。

第三，人大监督是启动人民法院内部监督的有效形式之一。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可以及时有效地启动人民法院内部审判监督程序和其他内部监督程序，从而依法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

因此，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要求，是贯彻实事求是、依法纠错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加强队伍建设，遏制司法腐败，树立公正司法形象的客观需要。

不受制约监督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多一些监督就少一些司法腐败，就

少一些司法不公，就多一份形象，就多一份认可。

因此，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法定不移的，是完全必要的。全市法院上上下下逐步统一了这个认识，摆正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接受监督的自觉性不断增强。

二、明确职责，完善制度，不断强化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工作力度

为了使接受监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的若干意见》和市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规定，我院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强接受人大及人大代表监督工作的暂行规定》及《关于接受市人大常委会监督，加强同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工作联系的办法》，对我院制定的有关指导审判、执行工作的规范性文件报备审查、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审议法院工作报告的意见和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批评以及市人大常委会转办、交办的信访件的办理、重大事项报告等项内容作了具体的规定。明确与市人大常委会联络的工作机构为中院办公室，有关事项的办理，由院主要领导负总责、办公室主任负责督办、业务庭室负责人具体承办。彻底改变了过去法院在接受监督方面职责不明确、办理不规范、工作

无督办、办结无期限，致使办理质量不高，人大代表满意率低等被动局面。通过这些制度、措施，我院已经基本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的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工作机制。

三、高度重视，认真负责地办理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人大转办交办案件

人大和人大代表围绕人民法院工作提出各种批评、意见和建议，既是人大代表忠实履行法定职责，行使监督权的体现，也是促使人民法院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不断改进思想作风、审判作风、工作作风，提高执法水平的重要途径。认真负责、优质高效地办理这些批评、意见和建议，是人民法院加强与人大代表联系、自觉接受监督的主要形式。在具体办理过程中我们坚持做到：

一是主动听取意见和批评。几年来，每次全市人大会议期间，我院均选派法官，分成若干小组，由院、庭领导带队，分别到各代表团认真听取人大代表们审议法院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和批评。然后及时整理，院党组逐条进行研究、整改，并将整改意见按时报送市人大常委会及有关工作部门。

二是认真办理意见和建议。为了把办理意见和

建议工作落到实处，我院对每一起意见和建议都确定责任领导，确定承办部门和承办人，进行检查督办。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有关加强法院队伍建设、增强服务宗旨意识、解决执行难、改进执行收费办法、注意个案审判不公、加强法院宣传工作等意见和建议，院党组及时进行研究，决定从整顿审判作风、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对队伍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加大改革力度等多方面加以改进。在办理人大代表意见工作中，对人大代表的建议案办结率、见面率和满意率均达到 100%。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每一件建议，都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积极加以改进。如对人代会期间人大代表提出的对经济犯罪判缓刑过多的问题，我院迅速组织了对全市法院近三年来的部分经济犯罪案件的执法检查。通过认真自查和检查，弄清了对贪污、贿赂和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的打击处理情况，总结了这方面的审判经验，同时也发现了少数案件确实存在判处缓刑较多、个别案件处刑偏轻、同类案件基层法院之间处理不平衡等问题，及时提出了改进措施和工作要求，这将对今后依法正确处理这类案件起到积极的政策指导作用。

三是依法及时办理转办、交办的信访案件。随

着近年来审判案件数量逐年增加，案件审理执行难度不断加大，当事人上访申诉也呈上升趋势。市人大常委会或者各有关专门委员会受理当事人上访申诉转办交到法院后，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及时依法定程序办理，该纠正的坚决纠正，该改判的坚决改判，该督办的抓紧督办，该追究的严肃追究，坚持依法公正办案。

有的案件因种种原因一时难以办结的，也及时向交办机关说明情况，报告工作进度。为进一步改进审判作风和工作方法，今年以来，我们进一步采取了多搞人来人往，少搞文来文往的做法，要求承办部门在办理过程中或者办结以前要多与申诉人见面，事先征求交办的领导的意见，以保证办理结果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努力提高办案质量。

对交办案件，我院主要领导坚持亲自处理，具体批办和督办，重点案件，院庭领导亲自上门与申诉人见面，听取意见，做深入细致的疏导和息诉工作。交办、督办案件绝大部分都已办结，多数案件经做工作当事人表示服判息诉，有的通过督办使问题得到及时妥善解决，少数案件确有错误经启动再审程序得到纠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长期上访申诉的案件得到了圆满解决。

四、采取多种形式，不断拓宽听取意见的渠道，把审判与监督有机结合起来

为了扩大主动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大代表监督的层面和效果，我院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聘上来等办法，利用多种形式，加强与人大常委会及人大代表的联系与沟通。

一是进一步做好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担任执法监督员或人民陪审员的工作。在总结过去成功做法的基础上，去年全市法院又结合市人大和市政协换届，重新聘请了一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担任执法监督员，扩大了监督员的代表层面。并通过不定期地召开执法监督员座谈会、特邀听庭、互致信函、聘请人大代表担任陪审员陪审案件、报送重要简报信息等方式，加强同监督员的联系，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不断改进法院工作。

二是经常开展邀请领导和人大代表视察、检查工作、到会指导、旁听庭审等活动。对市人大常委会及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组织的视察、检查活动，我们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积极汇报工作。

同时，我们还主动邀请市人大领导同志和人大代表到法院视察、检查指导工作。对在视察、检查中人大领导同志的指示和要求、人大代表提出的意

见，虚心接受，努力改进。

三是加强请示、报告，增强接受监督的主动性。我们除了每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接受审议，每年中途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报告半年工作，接受评议以外，对法院队伍建设、审判工作和法院改革等重要工作和部署，也都及时地向市人大常委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领导汇报，取得支持；对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加强请示，请求指导；对全市性法院工作会议、院长会议邀请人大领导同志出席会议作指示；重要文件、简报、报告等有关材料，及时向市人大常委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报送，以便人大领导同志及时掌握和了解法院的工作动态，主动地把法院各项工作置于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之下。

此外，我院还免费为宜昌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以及聘请的执法监督员订阅了《人民法院报》，赠阅我院机关刊物《宜昌审判》，为人大代表、执法监督员及时了解法院工作进程、重大审判动态提供条件和方便。通过这些工作，努力使人民法院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人大及其常委会、人大代表加强对人民法院的监督，既是对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有效制约，

也是对人民法院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的有力促进。实践证明，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全法院的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效果是明显的，有力地促进了司法公正与效率。各项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在队伍建设方面，坚持抓班子、带队伍、转作风，在加强政治业务、纪律作风、法官职业道德等项学习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制度建设和检查督促落实的力度，严明了纪律，严格了违法审判、办案差错责任追究和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干警的纪律作风意识明显增强。可以说，审判、执行工作和严管队伍成效的取得，离不开市委的正确领导，离不开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大代表的监督与支持。

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离不开监督。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着力做到“四个到位”：

一是坚持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到位。不仅要按照规定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好法院工作，虚心听取和接受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要将法院改革、审判工作、队伍建设等重要工作部署和重大事项继续及时地向人大常委会及其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专题报告，以切实增强人大监督的针对性。

二是坚持接受人大工作检查到位。对人大常委

会、专门委员会领导和人大代表的视察、检查工作，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积极配合，搞好汇报。尤其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和热点焦点问题，要主动邀请人大代表进行视察、检查和评议。

三是坚持办理代表建议到位。无论是人大代表在大会期间或闭会期间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还是人大领导同志交办、转办的个案，都要认真负责、及时有效地办理，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以切实增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实效性。

四是坚持开展活动到位。尽量多组织开展一些活动，加强监督与被监督者之间的联系、理解与沟通，扩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层面和效果。

总之，人民法院一定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强化自觉性和主动性，使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工作真正落到实处。通过接受监督，不断促进司法公正与效率，促进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促进审判作风的转变，促进人民法院形象的树立，努力使法院工作上新台阶，让党委放心，让人民满意。

管理强院人才兴院形象树院

当前，我国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依法治国已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

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规划和部署，提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法律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上海正处于改革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2004年又是金山区实现“三年翻一番”目标的关键一年，对全面实现金山跨越式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上海金山区人民法院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以实现公正与效率主题为核心，全面推进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深化法院改革，努力探索完善符合司法工作特点和规律的法院管理机制，实现管理强院、人才兴院、形象树院，为维护社会稳定，为实现金山跨越式发展和“三年翻番”目标提供有力的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

一是牢固树立新时期审判指导思想，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审判指导思想。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司法为民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要把司法为民思想根植于每一个部门、每一个法官，落实到每一个审判、执行环节中。要通过司法为民思想的学习，把司法为民这一外在的要求内化成法官内心信念，外化成自觉行为，树立公正、公平、公开、公信的职业理念，从而有效提升队伍的整体素质，形成向上向善的院风院貌，提高法院的司法公信度和司法权威，树立法院公正公平的形象。

我们在用司法为民思想指导审判实践的同时，要坚决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在 11 个方面推出的 23 项便民措施和上海高院的 15 项便民措施，要结合金山区情、结合本院实际，不断地、持之以恒地调整、深化本院已经制定的十二项便民措施，努力让当事人切身感受到人民司法的公平、公正和人文关怀，感受到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二是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刑事审判要严厉打击各类犯罪，保护市场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行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探索、总结前几年非监禁刑适用的经验和效果，与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开展社区矫正，促进对罪犯的教

育、转化，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民事审判要及时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高当庭宣判率和一次开庭成功率；对涉公司法和其他投资法律的案件要加强调研，精心审理；要及时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处理涉动拆迁案件、劳动争议案件和其他群体性案件，确保矛盾不激化，确保当事人的权益得到保障，确保不因个案的处理影响社会的法制环境和投资环境；行政审判要树立一案一精品意识，积极稳妥地审理行政案件，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促进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改革和职能完善；执行工作要做到严格执法、文明执行，确保执行工作继续在全市法院中处于领先地位，对拒不履行法院裁决的，要坚决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刑法适用、民事强制措施采取、公布被执行人名单由社会舆论进行监督等方式强制、督促其履行，确保法院裁决的权威，培育社会诚信氛围的形成；继续加强内部审判监督机制的规范化建设，完善内部纠错责任机制，为院领导和审委会决策提供有益的建议；立案庭要进一步加强立案窗口建设和维稳机制建设。

三是完善管理机制，强化管理职能，实现管理强院。

明晰审判流程管理、队伍管理、行政管理三大管理体系的关系和各自职责，合理分配审判资源，保证各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职，互相协调，互相监督，不断提高法院司法管理水平。以审判工作为中心，完善审判流程管理机制；以维护审判的公信和效率为价值取向，改革、强化行政管理机制；继续完善岗位目标考核机制。

四是以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为契机，努力提升队伍整体素质。

通过开展“塑造上海法院精神”主题活动，提高工作人员精神境界和文化修养，使全体同志树立忠诚意识、公正意识、服务意识和效率意识，在全院形成浓厚的法律氛围；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完善法官选任制度，继续探索完善中层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探索法官、书记员分序管理；加强业务培训，建设学习型法院。继续加强高学历人才的培养。

五是强化内外监督，畅通监督渠道，推动法院工作全面进步。

自觉将法院各项工作置于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之下，并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进一步增强人民法院由人大产生、受人大监督、对人民负责的宪

法意识。要完善与各镇、街道人大代表团的联络制度，坚持定期走访、召开座谈会、邀请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视察法院工作、旁听案件审理、通报法院重大工作事项、征求对法院工作意见和建议等，实现接受人大监督的规范化、制度化。

同时，继续主动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等广泛的社会监督。继续从源头和机制上狠抓党风廉政，强化“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和“不能为”的防范机制在内的廉政制度体系的建设。

要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严格内部纪律约束，继续加强落实廉政谈话警示制度。对出现的问题要严肃查处，从根本上纠正审判作风和执行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人民法院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们要在区委的领导下、区人大监督及高院的指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全面推进审判工作，深化法院改革，加强队伍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金山经济和社会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提高司法效能树立公正形象

2004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省、市、区三级党委、政府提出的实现“两个率先”的关键之年。针对我院地处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独特优势，面对区域经济大跨越、大发展的大好机遇，我院将瞄准新目标，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提高司法效能，树立公正形象，全力为“两个率先”提供优质的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

司法理念求创新。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法院必须不断创新司法理念，在服务大局上更加有所作为。为此，法院在司法理念上必须确立“三个统一”。

一是坚持司法公正与服务大局的统一，以服务大局的成效体现司法公正；

二是坚持严肃执法和能动执法的统一，找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佳结合点；

三是坚持强化审判职能与延伸司法服务的统一，进一步拓展服务领域。

司法作风求形象。司法作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法院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为此我院抓队伍建设将持之以恒，常抓不懈，

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公正，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司法为民的意识贯穿于队伍建设的始终。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建立法官与律师的隔离带，杜绝法官与律师的非正常关系。通过开展“司法公正树形象”活动，重点排查司法为民落实不力、公正效率坚持不实、群众反映较大、议论较多的问题，从人民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从人民需要的地方做起，向人民期望的方向努力。

以建设“学习型法院”为载体，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把增强法官的学习竞争力作为提高法院素质的“第一要务”，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全院以共同的奋斗目标为牵引，互信的团队精神为动力，和谐的内部关系为依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力推动法院工作再上新台阶。

司法效益求突破。全面、充分、有效地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司法服务和法律保障，最大限度地实现审判工作的司法效益，是法院新时期的职责所在。我院将强化审判职能，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抓紧破产案件审理，探索资产变现的有效途径，攻克变现难题。加强清算队伍的培训，提高破产清算效率。

依法及时审结涉及区属利税大户企业的经济纠

纷案件。平等保护全区各类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为企业改制服务，促进全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加大执行力度，全力维护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成立专项执行小组，采取专项执行、集中执行、突击执行相结合的方法，争取最大程度地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强化稳定意识，确保一方平安。坚持“严打”与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相结合，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全区社会稳定。树立“和为贵”思想，从事关发展、稳定的角度，积极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群体性事件，保证政治、经济、社会效果的统一。

对基层法院化解社会矛盾的思考

我们当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这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的过程。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权利意识在觉醒，而新的规则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各种利益关系此消彼涨，各种价值观念交互碰撞，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人民法院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事实上处于各种社会矛盾的最前沿。

作为基层法院，必然处于各种矛盾交织的风口浪尖之上。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是人民法院在社会转型时期所担负的一项重要职能。对促进市场经

济的健康发展、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基层法院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

从基层法院的司法实践看，当前面临的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改制、破产涉及到的劳动及社会保障问题。在企业改制、破产的过程中，有一些企业在出售、产权转让、破产的过程中，对原有职工的安置工作未能妥善解决，或者拖欠职工工资、养老金、劳动保险、医疗保险费用等，引发职工群体上诉，有的甚至采取停工、闹事、堵塞道路等过激措施，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2、征地拆迁安置问题。在城镇建设、招商引资等过程中，一些地方违规征占买卖土地，补偿标准较低且被层层截留克扣，失地农民得不到妥善安置，拆迁户不能及时回迁，房地产开发商损害住户利益等问题引发矛盾。由于拆迁安置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重大利益，一些当事人在要求得不满足后，也会采取一些过激措施。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审理、执行难度均较大。

3、涉农案件审理难度大。一些村组违背民主议定原则，发包的任意随意性较大，将村集体的土

地、资产低价发包。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提前终止承包合同、同一块土地发包给多人，引发矛盾。一些村组财务会计管理混乱，向农民出具欠条不规范，帐务往来记载不规范，有的甚至根本未入帐。农民起诉村组要求偿还债务，村组不认帐。

4、执行程序中涉及的矛盾较多

一是涉及政府案件的执行难，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企业职能未完全分离引发一系列诉讼，在判决政府承担赔偿责任、还款义务的案件中，法院往往要考虑与政府的关系协调问题导致执行困难，或者长时间得不到执行，当事人对此意见较大，认为法院在“官官相护”，而一些乡镇部门也因执行对法院产生意见，在地方组织“评议”法院时往往投反对票。

二是农业税等行政执行案件中，农民认为村组欠自己的债务应当相抵，而法院认为只能一事归一事处理，当事人对此也很不理解。即使农民起诉村组，由于履行能力问题也往往难以执行到位。

三是普通执行案件仍然存在“执行难”的问题。一些被执行人千方百计躲避执行，或外出打工或转移财产，法院客观上难以执行。权利人对自己通过诉讼仍然不能及时实现其权利，感到非常不

满，特别是一些如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巨额赔偿案件。对法院发放的债权凭证，当事人也认为是法院在“糊弄”自己。

5、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影响农村稳定。一些因日常生活琐事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农村发生较多，有的构成轻伤成为刑事自诉案件。但有的公安部门认为刑事自诉案件应由法院处理，对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不够，有的加害人甚至外出逃跑，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在民事赔偿中，由于法律规定有赔偿标准，加上当事人自身过错等因素的考虑，当事人对赔偿数额不满，认为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转而怨怨相报，寻求自力救济。

6、商事纠纷引发矛盾。商事案件目前总体数量呈下降的趋势，但由于商事案件涉及的标的往往较大，有的可能是当事人一生的积蓄。由于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履行过程中没有注意保护自己权利，条款不严谨，使不讲诚信的一方当事人有机可乘，在涉讼时自己又不能提供相关证据，导致自己败诉。

法院面临的社会矛盾还有很多，比如相邻关系纠纷往往矛盾较大，当事人往往对土地使用权、相邻关系通行权等各执一词，因此还经常会引发打斗事件。在婚姻纠纷中，当事人对是否离婚、财产分

割、子女抚养上，也经常势不两立，矛盾尖锐，有的甚至发生“抢人”、损坏财产、伤害、杀人等恶性事件。

二、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

纵观法院所面临的社会矛盾，主要的一些特点表现在：

1、群体性事件增多。一些案件由于涉及的不是个别人的利益而带有明显的群体性。如破产企业职工安置问题、农村集体诉讼问题。群体性事件往往具有较大的社会破坏性，影响生产生活秩序、法院乃至行政机关的工作秩序，有的还会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有的还聘请律师、寻求媒体支持，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2、对抗性明显增强。法院所面临的社会矛盾总体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它的对抗性色彩却越来越明显。当事人因矛盾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就会采取越级上访甚至进省进京上访，有的采取闹事的方式以期引起注意，如长期纠缠、上访请愿、冲击机关、阻碍交通等。有的直接采用暴力手段，如爆炸、投毒、毁容、自杀或他杀。

3、物质利益色彩浓厚。目前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是实质上是涉及当事人利益的问题。由于自

己的权利得不到实现，或者在利益调整的过程中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而这些在过去属于隐性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一些职工与单位之间的矛盾，过去都是单位内部解决，现在则经常通过诉讼来解决。

三、当前法院面临的社会矛盾原因分析

法院之所以面临如此众多的社会矛盾，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综合因素决定的。

1、法院职能的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法院必然要承担更多的解决社会矛盾的角色，法院不再只是国家的专政工具，而要承载更多的社会使命。在过去，社会矛盾、纠纷主要通过行政途径来解决。

当事人有纠纷，可以找单位、找政府。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人们更多地依赖法律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解决纠纷。以往许多可以通过单位、村组解决的问题都提交到法庭上来。有的甚至是五十年代的历史遗留问题，如某企业一批老职工要求企业归还合作化时期的入社股本。

这样，法院的压力增大。随着行政管理职能的转变，这部分的工作实际落到了法院的肩上。而且，在目前通过行政程序不能最终解决的问题，最后也往往到了法院，因为法院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

后一道屏障。

2、利益格局的调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法治建设的加快，利益关系和格局的不断调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逐渐在法院显现出来。当事人的权利意识增强，通过诉讼解决纷争成为更多的选择。如在一些企业、乡村经济组织存在“新官不理旧帐”的现象，后任法定代表人对前任遗留债务不予承认，从而引发诉讼。民事、行政案件中的矛盾，是当前法院面临的主要矛盾。在行政诉讼中，涉及到的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在民事诉讼中，涉及到的则是自己权利与他人权利的冲突问题。

3、法院对当事人权利保护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是法院处理案件不公正，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的法官在办案时偏袒一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裁决。或者由于认识水平的问题，在案件的事实认定上、法律适用上不恰当。

二是办案效率不高，虽然法律上有案件审理期限的规定，但有的案件是应当尽快解决的却拖到审限的最后，或者不符合条件的也办理审限延长手续，有的案件多次鉴定、公告，导致当事人的权利

难以及时实现。

三是执行力度不到位，在执行中强制权利人作出让步，使当事人的权利实现打折扣。当然，现在到法院诉讼的案件疑难复杂的比以前增加，法官审理案件难度加大、法律适用困难，也是造成矛盾的重要原因。

4、当事人法律知识的欠缺。主要表现在，一是缺少诉讼风险意识，把经营风险、败诉风险归咎于法院。如有的当事人明知对方没有履行能力仍然向法院起诉，结果判决胜诉后却不能执行到位。过去人与资产是紧密相连的，就是人走了，资产还在，所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而在今天，人员的流动频繁，和尚与庙都是说跑就跑，诉讼中有的当事人更是借机外出躲避债务，给法院审理和执行都增加了难度。

二是对诉讼规则缺乏应有的了解，如向法院提供证据超过法定的举证期限而败诉，不服一审判决却不提起上诉而是继续到原审法院纠缠不休。还有的判决虽已生效，但权利人却因不懂申请执行或超过申请时效而法院不予执行，认为判而不执的责任在法院。

三是不通过诉讼程序却通过上访解决问题。当

事人不服法院的判决，不断地向各级法院、行政机关进行上访，这些案件的上访量已经占到信访机构接访量的一定比例。这种现象的背后实际上体现了“官本位”的思想，把自己主张权利的希望寄托于某一级官吏的身上，努力向高位阶的官员去索要自己所需要的正义，乃至出现“千方百计进京城”的现象。

四是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的公正性理解不当。由于法院的判决是从法律专业的角度，难免有一些案件与普通民众的认识水平是不一致的，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事人就会认为司法不公，特别表现在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一致、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因举证原因导致败诉的案件中。另外，法院所审理的每起案件都是社会的一个矛盾对立面，对于当事人来讲，无论法院作出怎样的裁判，都可能有公正和不公正两种截然相反的感受，有的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期望值过高。

四、基层法院化解社会矛盾的对策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基层法院只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才能不断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化解社会矛盾：

1、坚持公正高效司法。“公正与效率”是法院工作的世纪主题，要从根本上解决法院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就必须坚持司法公正，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不断提高审判效率，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让当事人的权利得到及时的实现。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提高当庭宣判率。

目前在基层法院存在着简易程序复杂化的倾向，要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为依据，积极探索简易程序改革。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在遵守程序规范的前提下，努力追求实体公正。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极少数裁判确有错误的案件依法改判。

2、坚持人性化司法。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宗旨意识，坚持文明司法。积极行使释明权，向法律知识欠缺的当事人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防止当事人因法律知识的不足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通过巡回办案、法制讲座、案例报道等各种形式进行法制宣传，以案释法。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职能，扩大案件审判的社会影响。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努力钝化矛盾。

3、扩大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从世界范围来看，“诉讼不是万能的”已经成为共识。许

多国家都推行诉讼替代解决机制(ADR)，以不断拓宽纠纷解决机制，舒缓法院的压力，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社会矛盾，应当是诉讼、调解、仲裁等多管齐下，鼓励当事人通过非诉讼途径解决纠纷。在此方面，我们有很好的“东方经验”值得发扬。应当充分发挥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职能作用，积极培训人民调解员，把矛盾尽量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4、依法切实处理上访问题。认真对待群众上访，不能久拖不决。要本着彻底解决问题的原则处理信访，对信访中发现的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坚决纠正。对无理缠访的，耐心解释，以理服人，对以上访为手段扰乱社会秩序的依法处理。对有关部门秉公执法或者司法，但当事者还是自认为受了不公的待遇、听不进别人的解释和规劝的，可以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

5、维护司法权威。在现代法治国家大多奉行“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任何解决不了的纠纷最终都会流向法院，由法院作出也许仍不为纠纷当事者所满意的最后自然也是最权威的裁决。应当维护生效法律文书的既判力，对案件没有错误的不能轻易进

入再审，更不能多次反复改判。判决不具有稳定性，只会导致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对立情绪更加高涨。同时，要加强与人大、政府等部门的沟通与协调，争取理解与支持，不断优化法制环境，共同使法院面临的社会矛盾不断得到化解。

以司法为民为宗旨促审判工作上台阶

司法为民是“三个代表”在司法工作中的具体体现。2003年，北京铁路运输法院把司法为民作为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院审判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审判永远是法院的中心工作。自去年8月市高院下发《关于指定北京铁路运输两级法院受理民商事纠纷案件范围的规定》，扩大铁路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后，这个院受理的民商案件和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大幅度上升，诉讼标的额达1.5亿元，并首次出现了涉及企业改制、行包快运等合同纠纷案件，及当事人为全球知名企业、总标的达7800万元、审理难度很大的批量案件，铁路交通事故侵权损害以及高压电致人损害赔偿等案件也大幅度攀升，一旦审理不当就会影响社会稳定。

面对困难和压力，北京铁路运输法院一是坚持司法公正，平等保护市场经济主体，他们把民商审

判定位在定纷止争、化解矛盾上，充分发挥调解制度在民商审判中的作用，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坚持落实便民措施，以不偏不倚的立场，公正、平等、高效、中立地审理民商案件，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二是坚持简易程序快速审，当即送达、当即调解、及时结案，以公正的立场、娴熟的业务，顺利审结案件，赢得了双方当事人的好评。

三是确保社会稳定，在案件审理中发现不稳定因素时，及时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如广安门劳动服务公司与被告王树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宣判时，被告王树军情绪激动，扬言要到天安门和幼儿园制造流血事件，法院及时与北京市公安局和铁路公安处及其住地派出所沟通情况，并连夜赶到其家中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力争将不稳定因素降到最低限度。

四是体现司法为民，在保证当事人诉权的同时，千方百计为当事人考虑，尽量减少当事人出庭的次数，对生活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给与缓缴或减免诉讼费，今年共缓交诉讼费 481062.13 元，减免诉讼费 3381.5 元。

五是确保文书质量，通过理论学习、论文研讨、

文书讲评、层层把关等多种方式提高裁判文书质量，有一份判决书获得北京市高院二等奖。年内实现刑事和民商审判法定期限内结案率 2 个 100%，实际执结率 76%，执结标的额到位率 76%，无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或超审限案件，均创建院以来最好水平；通过审判和执行工作防止铁路企业国有资产流失 1 亿 4860 万元，是 2002 年挽回经济损失的 46 倍，创历史新高。

抓住机遇努力创建“三型”法院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全面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人民法院必将承担起日益沉重的历史使命和具体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司法改革置于重要地位，提出了明确任务，为开创法院工作新局面开辟了广阔空间。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人民法院将致力于寻求和构建能更好地承载现代司法价值的制度模式，最终实现法院的现代化。盛世当前，务必奋勇当先，作为省会城市的城区人民法院，我们更应当审时度势，对发展机遇保持高度敏锐性，既立足实际，又体现新时期法院工作的总体要求和现代司法规律，努力创建服务型、学习型、现代型“三型”法院，以转变观念和提高队伍素质为制动点，一手抓队伍管理和制度创新，一手抓案件审判和装备建

设，软件与硬件并重，不失时机地推动法院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一、创建“服务型”法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社会主义的法院是党领导下的审判机关，必然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创建“服务型”法院，正是人民法院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近年来，在司法民主与文明的潮流中，人民法院不断改革创新，为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后要以建设“服务型”法院为目标，加大服务力度，扩大服务领域，增强服务成效。

在服务的总体方向上，要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现司法被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司法独立性与坚持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的统一，遵照司法程序与走群众路线的统一。

在具体服务过程中，要务真求实，出实招办实事，认真查找问题，做到扎实改进，全面提高。

首先要在转变观念上下功夫。人民法院的服务可以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在诉讼过程中为当事人提供文明的诉讼环境，把司法功能融入到司法的人文关怀中，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二是在诉讼终结时作出一个公正裁判，既符合

法律之规定，也合乎公平良心的职业道德要求，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三是通过本职工作但又不限于本职工作，发挥业务专长，普法于社会，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致力于全社会的法治化建设。为此，要充分认清审判权的来源和本质，树立审判服务理念。要坚决摒弃封建落后的长官意识，加强宗旨观念，真正做到亲民爱民为民；要认识到法院的服务功能与中立裁判原则具有不同的语境和指向，二者并不冲突，不能借口需要中立裁判为由弱化法院的服务功能，更要避免就案办案的狭隘思想；要广泛动员，把全院的认识统一到全面服务、长效服务上来，形成合力。

其次要在落实行动上下功夫。要把文明服务体现在从立案到判决、执行的全过程中，体现在尽可能地想当事人之所想、急当事人之所急的各项便民利民的措施中，体现在当事人感到公正、文明和亲切可信的每次接触之中。要认真做好立案接待，坚持热情服务，反对简单粗暴；对社会弱势群体要给予更多关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要优先服务，经济困难符合条件的要适当减免诉讼费用，帮助联系或指定司法援助；推行首问责任制，做到来信来访“事事有交待，件件有答复”；规范庭审程序和庭审

用语，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让证据摆在庭上，道理辩在庭上，是非断在庭上。

再次是要在履行职能上下功夫。继续强化刑事审判工作，既要严厉惩治犯罪，又要把握好宽严相济、不枉不纵的原则，尤其是要做好少年审判工作，体现对未成年犯罪以教育、感化和挽救为主的方针；妥善审理民商事案件，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维护个人、企业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努力创造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和睦的邻里亲朋关系，诚信有序的市场关系；依法审理行政案件，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公民的利益不受行政权力的不当侵害；进一步增强执行工作，探索和规范执行方式方法，竭尽全力兑现生效裁判。

最后是要在延伸服务上下功夫。将本职服务与延伸服务结合起来，扩大法院工作的社会效果，重点是要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和服务群众。要充分利用创建满意单位等有效载体，创新服务形式，拓展服务领域。积极组织业务骨干深入企业开展走访活动，搞好调查研究，提出合理化司法建议，帮助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组织法官走进社区帮助居民解决实际困难，积极关心群众疾苦，悉心宣传法律，让广大居民都能知法、用法，依法

维护自身权益。

二、创建“学习型”法院，不断提高队伍素质

学习型法院是在学习型社会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概念，具有相当广泛的含义。它既是一个学习提高的动态过程，也是一种人人争先的学习氛围和法院文化要素，但根本上都是围绕“如何学习”这个主题。现代社会知识庞杂，更新迅速，作为新时期的法官，既要学好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又要掌握一定的科技知识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才能适应职业发展需要，极富挑战，因而人民法院必须大处着眼，细微入手，寻找到合适的制动点，形成强化学习的永恒动力。要建立制度督促学习，创造条件鼓励学习，树立榜样带动学习，大兴学习之风，促使学习成为全体干警工作的第一要务，生活的第一需要。

建立制度督促学习，就是要发挥制度优势，既靠个人自觉学习又靠制度约束劝导学习。建立共同学习制度，把个人基础上的学习上升为集体的学习，以庭室为单位每周至少安排一次集中学习讨论，建立学习台帐，通过集体的学习与交流，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形成以多信息、多思考为基础的知识共享、集思广益的学习模式；建立学习核查制

度，力戒形式主义，对于学习时间、效果进行多种形式的核查，如定期在全院范围内举行以司法业务、政治理论等为内容的笔试，及时讲评结果，提高干警自觉学习的积极性；建立信息宣传调研考核制度，把信息宣传调研工作纳入目标管理，明确任务，责任到人，年终评优实行“一票否决制”，从而端正干警对信息宣传调研工作的态度，提高干警的写作能力和水平，在全院形成“人人调研、事事调研”的大调研格局。

创造条件鼓励学习，就是要多方努力，为学习提供各方面的支持。要用人才兴院，以精英强院，重视人才的引进与培养，鼓励干警参加学历教育，在时间和物质上给予一定照顾；每年都要留出专门资金，全面实行干警岗前、岗中培训，突出新知识学习和司法技能训练，真正做到与时俱进，不断提高法学理论水平和审判业务能力；此外，还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将具有丰富审判实践经验的业务骨干推向高等院校讲台，把长期从事教学科研的专家学者请进法院大门，加强法学实务界与理论界的联系，促使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树立榜样带动学习，就是要发挥榜样的作用，在全院营造学习氛围。在创建学习型法院过程中，

领导班子成员要做全院的榜样，率先垂范，带头学政治理论，学法律知识，率先总结学习成果，写出调研文章；中层干部要做本庭室的榜样，组织完成本部门的学习任务，要突出学习创新，对审判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勇于探索，谋求新思路，闯出新做法，创造新成果；要树立典型、表彰先进，为学习成果交流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将质量较高，有一定深度的调研文章集结成册，供大家参考借鉴，对学习有成的同志要予以奖励；推行文化治院，营造人人争先，你追我赶的浓厚学习氛围，不仅年轻的同志要学，年龄相对较大的同志也要学，要使学习与工作、生活融为一体，努力实现“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和“生活学习化、学习生活化”的目标。

三、创建“现代型”法院，全面推进各项工作

在建设服务型法院和学习型法院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提升，努力建成现代型法院。作为与传统型法院相对应的现代型法院，除了物质装备的现代化，还应涵括司法理念、司法组织体制、司法工作机制、司法管理机制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为此，我们要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具体工作：

——突破旧有思想框子，更新司法观念。

一是要强化“中立裁判”的观念，自觉抵制各种干挠，做到不偏不倚，不枉不纵；

二是要强化“司法公开”的观念，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度；

三是要强化“权利平等保护”的观念，切实遵守非歧视待遇原则；

四是要强化“法制统一”观念，自觉摒弃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

五是要强化重视“法律事实”的观念，纠正审判活动中对“客观事实”的片面理解，避免由于这种片面理解而无休止地探求所谓的案件客观真实，造成损害司法权威、司法效率的不良后果。要进一步加强司法权性质、运作的认识与理解，不断强化法官独立意识，以理念创新推动与促进机制创新、制度创新，真正实更司法制度的现代化。

——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法官职业化水平。以法官职业化建设为主线，积极稳妥地对现行法院人事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完善。要严把法院进人关，严把法官选任关，保证精通法律、品行端正、广受尊重的职业法律工作者被任命为法官；建立科学的法官评价体系和程序，真正发挥其考核、评价、激励、督促和作为晋级、奖惩依据的作用，

做到权与责统

一、才与名统

一、位与利统一；要加强法官的作风建设，努力培养和发扬人民法官的优良作风，密切人民法官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完善中层干部竞争上岗，一般干部双向选择机制，发挥中层干部的模范作用和审判精英的辐射作用；要大胆尝试法官、法官助理、执行员、书记员、司法警察、司法行政人员的分类管理，理顺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职业培训，努力培养和造就公正、高效、廉洁的职业化法官队伍。

——改革审判组织和审判方式，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在审判组织上，重点是要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责，严格做到审理与判决合一，将司法行政权与审判权相分离，保障法官独立裁判权，逐步淡化司法活动的行政化色彩；同时，进一步规范审判委员会的活动，完善审判委员会的工作程序，真正发挥审判委员会对重大疑难案件的决策能力，防止其他审判组织对审判委员会的过分依赖。在审判方式上，一是要科学繁简分流，在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前提下，规范、推行普通刑事、民事案件简易化审理，规范审前程序；

二是继续研究和推进裁判文书改革，实现繁简得当；

三是要在研究新形势下的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充分发挥诉讼调解定纷止争的作用。

——改善法院物质装备条件，提高办案科技水平。要争取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大力改善办公条件，建立规范化的审判法庭和其他审判场所。要不断增强司法活动的科技含量，有效提高信息化管理在审判工作中的运用水平，推行电子政务工程。

一方面要更充分地发挥现有的局域网功效，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使案件流程监督、资料浏览查询、公文起草、审批、签发、归档等全在局域网内进行，实现内部无纸化办公；

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配合全省和全市法院系统范围内的计算机联网工程，并积极利用国际互联网资源，推进法院上网，宣传法院工作，逐步尝试、探索部分诉讼材料的互联网快捷传输。

传媒与司法：宪法性权力(利)的冲突与界定

2003年7月，某省省委宣传部与该省高院联合发文规定：“依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依法公开宣判的案件，

新闻单位可以进行报道，但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对事实和法律负责，并且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新闻工作者立即做出强烈反应，纷纷发表言论，对该文件进行口诛笔伐。

再如，近年来不少案件法院尚未裁判，媒体就进行“定性”报道，对法院公正裁判形成较大的压力。笔者对 97 位基层法院院长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 36.8%的院长认为此类报道对“裁判”有较大影响，46.39%的院长认为此类报道对“裁判”“有一定影响”。这些事例，仅仅是新闻媒体与法院发生冲突的一个缩影。

在民主法治国家，均存在着新闻媒体、法院与诉讼案件当事人(甚至包括诉讼参与人)三者之间的多重矛盾或冲突。新闻媒体存在着了解、知悉案件审理过程与结果的欲望和利益；法院存在着保证诉讼当事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和保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序良俗的责任，以及维护自身的权威、公平、独立形象的义务；诉讼当事人则有着保障自身接受公平、公正审判，维护隐私、名誉、形象等利益与要求。

这些矛盾与冲突表现为自由报道与公正审判之

间的矛盾与冲突，它们构成现实社会的一道风景线，困扰着众多的政治家、法官和专家、学者，使他们不得不殚精竭虑地思考与设计解决这一矛盾与冲突的良策。

关于对旁听、采访自由与公正审判的界线 不公开审理的范围

从国际人权公约和民主法治国家的法律规定来看，公开审理是原则、常规，不公开审理是例外、特殊。无疑，不公开审理对新闻自由构成威胁和限制，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更高的利益，就不得不限制公开审判，并必然限制新闻自由。因此，合理地确定不公开审理的范围就成为既保护新闻自由，又维护公正审判的关键所在。

在英美法系国家，其法律并不采取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情形，而是设定不公开审理案件的条件。

以英国为例：法院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 (1)存在着法庭内部失序的可能性；
- (2)一名证人拒绝在公众面前作证；
- (3)公开听证将危害将来的诉讼；
- (4)案件涉及根据《官方秘密法》提出的诉讼。

可见，英国实行不公开审理的理由是，公众旁听诉讼将影响公正审判，或损害一定的公共利益，或损害诉讼参与人的利益。

采访手段的限制

在我国香港特区，有关法律禁止对法官、陪审员、证人、当事人进行摄影，甚至不允许速写或绘画，否则即是违法。这一法律传统是从英国承袭的。英国自 1925 年《刑事诉讼法》第 41 条禁止电视转播法院的诉讼过程，至今仍奉行不改。

美国的情况比较复杂。1982 年以前，按照全美律师协会制定的《司法人员行为准则》第 3A(7)条规定，禁止在一切法庭摄影、摄像。1982 年，全美国首席法官会议决定，由各州的最高法院就广播、电视及其他电子媒体的采访方式和权限，确定一个范围。此后，绝大多数州在一定程度内允许使用现代器材采访，但须经得法官批准，甚至事先必须取得当事人的同意。

在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2002 年以前是禁止携带录音机、摄像机、录像机进入审判庭的。但从 2002 年以来，情况开始变化，开始有限度地允许新闻记者使用摄像机、照相机，但是须事先申请，经法官批准后才可使用。

报道自由、评论自由与公正审判的界线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一般都反对“媒体裁判”（或称“报纸审判”、“电视审判”等），对于新闻媒体在案件未审结之前（即未裁判案件）作出有失公允、充满偏见的报道与评论，会以“藐视法庭罪”予以处罚。

英国在 1981 年通过制定藐视法庭法，修正了以往对待媒体过于严厉的传统。其核心是，对于未决案件的评论，必须是出现“不利于案件审讯或不利于案件解决的实质性的严重损害危险”时，方构成藐视法庭罪。该法还规定，新闻媒体可以采取以下理由为自己辩护：

第一，对诉讼的报道是公正和准确的；

第二，自己是无辜的公布或发行；

第三，是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任何报道与评论未满足上述三项辩护理由的，无论是故意或过失，均构成藐视法庭罪。在美国，法院现在很少适用藐视法庭罪，而是更多地采取必要的措施或手段，避免媒体和公众干扰法院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鉴于这两种权力在维护社会正义的同一性和在实现公正审判中的冲突性，我国应当通过立法，合理地规定各自的界线，以保障两种权力的正确、切

实地实施。

1. 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专门性法律，对公民与新闻媒体采访、报道、评论的自由权利，人民法院维持必要的法庭秩序、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保证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权限、职责以及操作程序作出规定和调整。

2. 法律(包括即将制定的法律)对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评论诉讼案件的行为之基本态度，应采取“保护为主，限制为辅”的指导思想。对于报道、评论未决案件的审理活动的行为，可以借鉴英美等国家的有益经验，实行所谓的“危险”标准。具体说，只要新闻媒介的有关报道、评论对未决案件的审理，未构成实质性危险，就不予以限制或制裁。英美两国有上百年的处理新闻媒体与法院关系的历史，而我国相对缺乏此方面的历史传统与经验，目前有关法律不完善，新闻自由与审判独立皆发展不充分、不到位，故应采取慎重、渐进的原则。在目前阶段，从保护人权和保障司法公正的目的出发，对新闻媒体的限制与英美等国家相比可稍严格一些，待民主法制建设比较健全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再做进一步改进。

3. 法律应当兼顾法院、新闻媒体与诉讼参与人

三者之间的正当权益。《宪法》既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和人民法院具有审判独立权力，同时又明确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另外，《宪法》第 51 条还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鉴于新闻自由、审判独立和人格权皆属宪法性权力(利)，在制定或完善有关法律时应当十分注意并妥当处理三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切实做到既保障了审判独立，又维护了新闻自由，还保护了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电子证据是净化网络利器

曾几何时，网络色情在我国像“毒瘤”一样不经意间蔓延开来，极大地破坏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环境，引发了近几年来青少年性犯罪案件的攀升。

抗击网络黄潮是个世界性课题。西方发达国家大概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启动了网上扫黄活动，比如美国国会于 1995 年通过两部法律，对在网络中传播色情和猥亵资料的故意犯罪予以惩处。在我国，则是从今年 7 月中旬开始，第一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清剿网络色情的专项行动。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全国各地司法机关迅速行动起来，动员全

社会的力量，要打一场围剿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的人民战争。

目前，这一斗争已经取得初步成果，正在朝纵深方向推进。不过净化网络环境单靠专项行动显然不够，更重要的是完善相关的立法，以及建立司法方面的长效机制。而重中之重则是加快电子证据立法，为司法人员惩治网络色情犯罪锻造利器。

众所周知，认定犯罪的前提是认定事实，而认定事实归而统之是证据问题。司法人员不可能借助“时空隧道”回到过去亲历事件，只能依据形形色色的人证与物证来揭示真相。我国过去打击网络色情之所以效果不好，并不是因为没有刑法、刑事诉讼法可依，而是因为在收集与认定证据方面存在缺失。现阶段虽然靠“专项战役”收获了喜人的成绩，但基本表现为“滤、堵、封”了大量色情网站，真正抓获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究其原因仍出在证据方面。

同传统证据相比，网络空间的电子证据有着鲜明的特色。它不像人证那样绘声绘色，也不像物证那样掷地有声，倒更像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幽灵。无论是在保存、传播还是感知方式上，这种证据都同电子设备、电子介质须臾不可分离，而且极易受到

难以察觉的篡改或破坏。

如果说在传统案件中，人们主要依靠各式人证与物证来定案的话，那么在网络世界里，人证、物证肯定退居次席，惟有电子证据才是解决法律纷争的制胜武器。有人誉之为新一代的“证据之王”。

因此，人类必须积极面对电子证据带来的挑战，努力探索应对方略。

一些国家在这一领域早已先行一步，如南非、加拿大与菲律宾分别颁行了《1983 年计算机证据法》、《1998 年统一电子证据法》与 2000 年《电子证据规则》，美国、英国与印度等国适时修订了本国证据法，而且它们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还确立了关于电子证据的大量司法判例。反观我国，电子证据的立法与司法状况亟待改善。不仅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尚未肯定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而且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部门性规章中涉及电子证据的极个别条款严重缺乏操作性，根本不能满足实际办案的需要。司法人员普遍不敢也不愿主动使用电子证据，更谈不上相关经验的积累。

打击网络色情无疑是电子证据大显身手的舞台。面对虚拟空间中花样翻新的色情活动，司法人员必须通过收集、固定犯罪嫌疑人上传的色情数码

资料、淫秽网站 IP 地址、电子聊天记录、电子公告牌记录、电子邮件记录等，顺藤摸瓜地揪出犯罪嫌疑人，最后绳之以法，这才是净网的治本之策。当正义之剑出鞘斩向网络色情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把目光转向一项改善司法武装的基础性工作：加快中国电子证据立法，构建切实可行的电子证据规则。

对人民法院纪检监察工作的几点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同志指出，人民法院的纪检监察工作是党和国家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法院纪检监察工作责任更加重大，要求更加严格，必须加强领导。笔者结合纪检监察工作实践，对做好新时期人民法院纪检监察工作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更新观念，深刻认识法院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性

《人民法院监察工作暂行规定》明确规定法院的监察部门是人民法院行使监察职能、管理监察工作的专门机构，负责对担负着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法院极其工作人员进行监察，保证公正、高效、廉洁、文明司法。从性质上确立了纪检监察部门在法院各部门中的作用地位有着其他部门所不可替代

的特殊性。因此，必须更新观念，充分认识新时期加强法院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性。

(一)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是促进司法公正高效的需要。人民法院被人民群众誉为“最讲理、最公平、最廉洁”的地方。人民法官如产生不廉洁行为，不仅是个人的品质问题，而且关系到损害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玷污人民法院形象的大是大非问题。受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人民法院和法官时常处于各种利益、关系的“风暴眼”上，要维护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使人民法院严格依法行使审判权和执行权，离开了纪检监察部门，审判权和执行权将失去有效监督，“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将时有发生，案件久拖不决、久拖不执，违法违纪事件得不到查处，从而滋长一些法官铤而走险，枉法裁判，亵渎司法权威，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将难以实现。

(二)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是加强队伍建设的需要。古时有“贪泉”，据说凡是喝过贪泉的人，都要丧失廉洁性，变得贪得无厌。东晋清官吴隐之“饮之泰然自若，终身清廉”。这说明只要坚守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外来的侵蚀是徒劳的。贪赃枉法的法官中，不少是典型的由思想滑坡逐步演变到经济上

贪婪、政治上蜕变。因此，在新时期加强纪检监察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经常开展警示教育，做到警钟长鸣，防微杜渐，帮助法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教育他们执法如山、清廉如水、司法为民，始终保持权力在手、重任在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审慎态度，从思想上筑牢防止权力滥用的铜墙铁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三）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是贯彻落实“两个条例”的需要。全国法院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法官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纪检监察工作，强化纪检监察部门对审判权、执行权的监督是贯彻落实全国法院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两个条例”的题中之意。法院要高度重视纪检监察工作，按照政治素质强、法律业务熟的标准配强配齐纪检监察干部，重视改善纪检监察干部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支持纪检监察部门大胆开展工作。

纪检监察部门要在上级纪委和本院党组的领导下，切实履行职责，认真开展督促检查，特别是要

加强对“两个条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做到审判权、执行权行使到哪里，纪律监督就延伸到哪里，有效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使法院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

二、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重要作用

法院纪检监察部门要在当地纪委和法院党组领导下，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监督制约职能、惩处维护职能、教育防范职能、支持保护职能，行使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监督检查，既要对法院审判行为进行纪律监督，又要对不执行法律、法规、政策和法院纪律的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和处理，还应建立健全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用卓有成效的工作树立“可亲、可信、可敬”的形象。

(一)加强对审判行为的纪律监督。所谓审判行为是指人民法院一切与审判有关，并具有行政管理意义的行为。既含有审判活动中的行为，也含有行政管理意义的行为。各审判业务部门和审判人员在审判活动中的行为受审判监督的多，而受到严格纪律制约的少，致使少数审判人员滥用职权，以案谋私，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徇私枉法，损害法院形象，走上违法违纪的道路。全国法院纪检监

察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强化对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监督。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纪检监察部门要重点监督审判人员在从事审判活动中所实施的行为是否严格依法，秉公执法；是否廉洁执法守法；是否存在吃拿卡要，以权谋私，徇私舞弊，贪赃卖法；是否有欺压群众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严格以国家法律、法规、法院纪律为依据，震慑个别越轨者，促进办案人员正确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法院纪律，模范遵守党章、党规，自觉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防止和减少违法违纪的发生，树立人民法院公正、高效、文明、廉洁的良好形象。

(二)加大对违法违纪的查处力度。当前司法领域的违纪违法甚至腐败现象依然呈易发多发的态势，利用审判权、执行权索贿受贿、枉法裁判的现象时有发生。法院纪检监察部门要毫不手软、持之以恒地严肃查处，要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壮士断臂”的气概，坚决彻底地清除法院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对于其他违纪违法行爲，也要按照有关纪律，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一人，处理一人，绝不姑息迁就，以免养痍遗患。

要有自暴其丑的精神，自我揭短。对于极少数

司法腐败现象，虽然是“家丑”，也不能捂着、盖着，文过饰非。实际上，在权力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不断加强的形势下，盖是盖不住的。不能寄希望于问题不暴露，而是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发现问题要及时采取措施，“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同时，要坚决支持保护审判活动中的合法行为，对秉公执法、清正廉洁的法官要予以保护，对那些诬告法官、打击报复办案人员的要依法进行处理。

（三）建立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法院纪检监察工作是一项牵涉面广、千头万绪的工作，涉及到组织建设、审判管理、司法改革、队伍建设等不同层面，具有广泛性、持久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与法院各项工作联系紧密，是法院工作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最高法院肖扬院长要求法院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审判权和执行权行使的监督机制，建立相关责任制度，强化院长、庭长对法官和审判工作的管理、监督，注重对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监督制约和分权制衡，逐步解决体制、机制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漏洞，努力建立一套包括“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敢为”的惩治机制和“不能为”的防范机制在内的反腐倡廉制度体

系，以有效地预防和遏止利用审判权和执行权违纪违犯问题的发生。

三、协调配合，正确处理纪检监察工作涉及的几个关系

法院纪检监察工作经常与有关部门的工作发生横向或纵向、甚至交叉的关系。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对更好的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提高工作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正确处理法院纪检组与法院党组、当地纪委的关系。法院纪检组在法院党组和当地纪委的双重领导下工作，纪检业务以当地纪委领导为主。法院纪检组应当经常地向院党组和当地纪委积极反映情况，请示汇报工作，处理重要或者复杂案件时，在向院党组报告的同时，应及时报告当地纪委，以取得院党组和当地纪委的领导和支持。法院党组也应重视和支持纪检组的工作，为纪检组开展工作提供条件。

二是正确处理审判工作与纪检监察工作的关系。审判是人民法院的基本职能，也是法院工作的重心。做好审判工作离不开纪律的保障。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等，全体党员干部都要严格遵

守。”实践证明，如果在抓审判工作的同时，忽视了纪律教育，审判工作就容易出问题，例如有的法院大楼盖起来了，人却倒下去了；案件数量增多了，群众的信任度却下降了；工作人员的生活待遇改善了，而法院在群众中的形象却受到影响。

因此，我们在大力抓好审判业务工作的同时，一定要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花大力气抓好队伍的纪律作风建设，要用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保障和促进审判工作的开展。

三是正确处理教育查处与爱护干部的关系。纪检监察工作的性质决定要对违法违纪干警进行教育查处，教育查处工作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一些干警对纪检监察工作认识不到位，认为是纪检干部在整人，有意与自己过不去。

但一些干警信马由缰，走上犯罪道路，才真正意识到纪检监察部门的教育处理是对干部的关心爱护，悔之晚矣。纪检监察干部要切实履行职责，大胆管理，严格要求，经常对干警思想上的偏差进行纠正，对行为上的失范进行批评，未雨绸缪，防范未然，确保单位不出问题，确保干部不出问题。

四是正确处理法院纪检监察部门与法院其他部门的关系。法院纪检监察部门与法院其他部门的教

育工作广泛交叉和重叠，有着十分密切的协作关系。纪检监察部门要协助、会同法院党组织和政工部门经常对党员干部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使党员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纪检监察部门要配合法院审判业务部门，结合法院审判执行工作，以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为主线，紧紧围绕司法为民，廉洁奉公，秉公执法等内容进行教育，促使法院党员干部在审判执行活动中遵纪守法、廉洁高效。

对加强审判委员会建设的几点思考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一项司法审判制度。这项制度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并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审委会制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第十八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完善公正高效的审判工作机制，明确划分审判组织的职责，进一步规范独任法官、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活动，优化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审判机构的设置和审判职能的分工上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对审判委员会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审判委员会建设的确存在着人员组成专业化程度不高、职能作用发挥不好、工

作运行机制不规范等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审判委员会的自身建设。为此，在加强审判委会建设上，应该实现以下三个转变：

一、在人员组成上，审判委员会成员应实现由领导型向专业型的转变从法律规定来看，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的一级审判组织，行使的是审判业务方面的权利，而不是行政领导权利。然而在实践中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大都是院长、副院长、庭长等院领导，审判委员会委员往往与行政职务挂钩，大凡是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可取得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由于行政色彩较浓，使一些有学术专长，但行政级别不高的同志难以被吸收到这个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中来。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审判委员会成员大都有行政职务，因自身的行政事务较多，难以拿出较多的精力，研究讨论审判工作中重大问题，甚至在召开审判委员会时，经常有请假缺席现象，即时勉强到会，对研究问题不深不细，对研究案件不深不透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因此，审委会人员组成的行政化倾向，影响了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质量，也大大影响了审判委员会在法院内部的威信和声誉。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细化，案件类型和分工更加具体明确，审判工作的专业性越来越强，由专

业人才组成审判委员会是众望所归。

吸收专业性人才进入审委会并不是意味着解决这些人的职级问题，要摒弃审委会委员必须同职级挂钩的做法，把那些业务精通、政治过硬、作风正派的法官吸收进来。专业性人才进入审委会，不但可以更好地解决审判中的专业性难题，而且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提高审判委员会所讨论决定案件的质量，保障案件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真正树立所讨论决定的案件在法官和社会公众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对进入审判委员会专业型人才的选拔可以通过提名、推荐、考核、评定等方式进行，做到唯才是举，惟贤是用。同时，将审判委员会中部分并不精通审判业务的同志解脱出来，充分发挥他们在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中的才能和智慧，真正做到人尽其才。

二、在工作职能上，审判委员会主要任务应由“审批”案件向宏观指导转变《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 22 条规定，“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在深化合议庭职责，不断提高审理案件质量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的问题，总结审判工作经

验，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作用。”根据这一指导精神，审判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研究有关审判工作的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而不仅仅是对案件的讨论研究。但在司法实践中，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对正在审理或者已经审理终结的案件进行再“审批”是个不争的事实。对审判委员会“审批案件”制度，专家学者们说法不一。

有的认为，审判委员审批案件于法无据，“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审判委员会职权之一是讨论案件，并无有权做出决定之说，而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委员会不仅有权讨论案件，而且有权做出决定，并特别强调‘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两个法律的内容明显存在冲突。”陈光忠教授主编的《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一书中强调，在实体法和程序法尚不完备的情况下，通过审委会对办案进行指导和监督，可以适当解决法律中的疑难问题。有的认为，审判委员会“审批案件”致使公开审判制度流于形式，使当事人申请法官回避的诉讼权力形同虚设，造成“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合议庭决定案件的权利遭到损害。苏力先生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在某些地方已

经起到或者更进一步起到在一个管辖内统一执法标准，提高法官素质的作用。

目前，审判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局限于对大量案件的研究，使审委会工作陷入讨论案件之中，没有足够的精力对审判工作中全局性、方向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同时，由于审判委员会功能的“异化”，使大量的案件涌入审委会，而合议庭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实际也造成了权责不分，使审判委员会成为某些合议庭的挡箭牌、避风港，把责任推到审委会，使审委会承担了大量的责任。2003年12月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肖扬院长提出“法院司法管理要按照放权、分权、制约的思路，加强六个机制的建设，即以审判委员会为主体的审判工作宏观指导机制……不断提高法院司法管理水平”。可见，发挥审判委员会在审判工作中的宏观指导作用，已成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方向。总结审判工作经验，从宏观上指导审判工作，对审判工作中的根本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已成为审委会的职能作用的集中体现。为充分发挥审委会的职能作用，使审判委员会从繁杂的案件研究中解脱出来，把大量的精力用于总结审判经验，探索审判规律，加强对审判工作前瞻性、预测性问题的研究，应逐步减少对案件

的研究讨论。为此，应做到两个方面，一是严把案件的进入审委会的关口，制定严格的案件进入审委会的准入制度，使是审委会只对少数重大、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的问题进行研究。二是明确进入审委会的案件的的标准，规定什么样的案件才可以进入审委会研究，限定审委会研究案件的范围。

三、在运行机制上，审判委员会工作应实现由无章可循向规范化、制度化转变按照建设现代化人民法院的要求，要进一步建立适应司法改革要求的现代化审判模式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目前，法律还没有对审判委员会的运作程序进行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没有统一的规范，其管理和运行机制还是个真空地带。

因此，加强审委会工作的规范已经刻不容缓，为改变审委会无章可循的状态，使审委会制度化、规范化，应依照组织法、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法院的司法实践，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一是会议制度。会议的召开应由院长提起，会议应提前告知，研究案件及研究重大问题，应提前通知审委会委员，并将有关材料，提前交审委会委员审阅。会议的程序，应按照听取汇报、提出询问、讨论研究、表决四个步骤进行。

二是保密制度。审判审委会委员和其它与会人员，应当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露会议内容，妥善保管有关会议材料，防止丢失和泄露。

三是审委会委员旁听案件制度。定期组织审委会委员旁听案件的审理，以便委员会了解案情和讨论案件能充分及时表态。

四是回避制度。按照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审委会研究案件应实行回避制度，确保审判案件公平公正。

五是案件点评制度。审判委员会讨论个案所发现的问题或总结经验，应有审判委员会专职人员整理，并召开审委会对案件进行点评。

六是审判形势分析制度。每季或每月对审判情况进行分析，对审判工作中敏感性或倾向性问题进行集中研究，分析原因，制定对策，确保审判工作健康顺利开展。

对司法为民思想的法理学思考——从董必武人民司法思想谈起

在 2003 年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最高法院党组向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发出了“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人民法院工作，牢固确立、全面落实司法为民思想”的号召；并在会议闭幕时，提

出要制定切实有效的司法为民、司法便民、司法护民的具体措施，包括在 11 个方面下功夫，建立和完善 10 项制度，制定 10 件司法解释，落实 23 项具体措施。

对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主张和举措，实务界和理论界的认识并不完全统一。赞成者有之，认为明确提出司法为民这一新的理论命题，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对新时期人民司法工作的本质特征有了新认识，上升到新境界；反对者有之，认为这是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主张简单地应用于司法领域，违背了司法工作特有的规律性。而在赞成者中，对于司法为民中的“民”亦存在不同认识，有的认为这个“民”应该是指具体当事人；有的认为这个“民”应该是指抽象意义上的人民或公民。

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司法为民思想，是人民法院今后应当长期坚持的一项指导方针；它深刻地揭示了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的基本宗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实践意义。

但也许人们要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新的工作宗旨？我们以前不是有人民司法的工作宗旨吗？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它提出的现实合理性

和法律意义何在？这些基本问题确实有必要从理论上给予明确回答，以及时澄清人们在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错误认识，从而为司法为民思想在工作中的具体贯彻和落实提供理论支撑和指导。

在此，笔者试从法理学的视角，并结合董必武同志的人民司法思想，拟就司法为民思想的相关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探讨，以求教于法律界同仁。

一、继承与发展：从人民司法思想到司法为民思想

(一)新中国司法建设与董必武的人民司法思想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类全新政权；与此相适应，新中国的司法制度也应是历史上没有的第一类全新司法制度。为此，中国共产党全面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要求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规范，建立人民的司法制度。这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董必武同志，自觉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西方法学理论知识，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司法工作的建设理论，为我国司法制度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被公认为新中国司法制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人民司法思想是董老司法建设理论的核心内容，曾长期作为我国司法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迄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董老十分重视人民司法工作的思想建设。他在1950年7月第一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指出：“我认为在司法工作初建之际，思想建设特别重要，必须把它视为司法工作的前提”；“一切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真理，我们应该坚持，司法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4]在第二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他又强调指出：“结合目前全国人民司法工作的情况，研究当前全国人民司法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是指人民司法工作的思想建设。”

董老还对人民司法的概念进行了阐释。他说：“什么叫人民司法？……人民司法的基本精神，是把马、恩、列、斯的观点和毛泽东思想贯彻到司法工作中去”；“人民司法基本观点之一是群众观点，与群众联系，为人民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他认为，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其他问题解决了也不能称作人民司法工作。概括起来，董老的人民司法思想主要包括如下观点：

1、人民司法专政观。1951年9月，董老在全国政法系统干部大会上指出：“政法工作有没有方向？

我们说有，就是直接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政法工作是什么？政法工作就是直接的、明显的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换句话说，就是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政权而斗争。”他还指出：“我们应该认识到司法工作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镇压反动派、保护人民的直接工具，是组织与教育人民群众作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

2、人民司法立场观。董老提出：“人民司法工作必须站稳人民的立场，全心全意地运用人民司法这个武器”；“如果不站稳人民的立场而站到另外的立场上去，那就要犯严重的错误。……所以，运用这个武器必须全心全意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他还从实践的标准问题谈到人民立场问题。他说：“实践以什么为标准？就是一切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标准，也就是一切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这个标准，这个出发点，就是我所谓的观点，也就是我们参加革命事业的关键”；“从个人利益出发看问题，个别问题虽能得到解决，但广大人民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只有从广大人民的利益着想，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个人利益也就在其中了。” [11]

3、人民司法公正观。董老深刻地认识到司法公正对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来保障司法公正。在 1953 年第二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针对司法工作存在错捕、错押、刑讯逼供和错判、错案以及积案等问题，他严厉地指出：“我们司法机关是教育人民守法的，如果自己违法，那就很成问题”；“为了克服这种现象，今后必须从立法方面，从健全人民司法、公安和检察制度方面，对人民的民主权利给予充分保护”；

“我们要防止错判，减少错判，就必须建立各种制度来保证。”他还强调：“错案不能光按百分数计算，因为错案虽然只占法院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几，但是对每一个冤枉的当事人来说，则是百分之百的错了。”

4、人民司法效率观。针对当时存在积案现象，董老提出：“即使我们立场站得稳，但工作方法不好，人民还是会反对我们的，我们积压案子、拖拉，人民就已经不耐烦了，他们说：‘在国民党当政时打官司要钱多，在共产党当权时打官司要寿长’”。[15]因此，他要求司法工作人员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及时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5、人民司法程序观。董老十分重视诉讼程序作用，历史强调按法律程序办事。他指出：“审判程序的规定要体现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各项制度，调节审判过程中的各项活动，以保证判决正确而同时又尽可能地迅速。有些法院没有认识到程序的意义，把它看作是形式问题而不予重视。”他对此进行了批评，并指出：“形式与形式主义是两回事”；“司法活动要具备一定的形式。世界上任何实质的东西，没有不以一定形式表现出来的”；“工厂有操作规程，我们办案也有操作规程，那就是诉讼程序。按照诉讼程序办案，可以使工作进行得更好、更合法、更科学，保证案件办得正确、合法、及时，否则就重来，甚至出差错”；[18]“如果不经过一定的程序，就把案子判了，那么这个判决就是违法的。”

6、人民司法便民观。董老十分重视司法便民问题，他指出：“研究怎样建立便于人民的审判制度，要设陪审制、巡回审判制，法院要设问事处、接待室等。”在谈到改进审判程序时人，他指出：“审判机关还是应该从便民着想，尽量使用手续简化，在农村和大城市不要强求一样。”

7、人民司法民主观。董老在论述相关审判制度时，还谈到司法民主问题。主要有以下观点：

法院审判案件组成合议庭，进行集体研究，发挥大家集体智慧，保证审判更能客观和全面，可以减少办案的主观片面性；

陪审员是直接从群众中选举产生的，对于情况熟悉，能把人民群众的生产经验、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反映到法院中，特别强调陪审员与审判员要有同等权利，认为这也是对审判工作的监督，可以减少错判；

针对实践中存在不准被告人自己辩护，不准请辩护人辩护等情况，他分析指出，要知道法院的判决不仅是使当事人信服，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广大人民的意志，要使群众信服；如果没有辩护，就是判得最正确，也不足以使人口服心服。

8、人民司法监督观。董老在谈到公开审判制度时，指出：“有人认为公开审判就是和公审大会一样，这是不对的。我们说的公开审判是审理案件时准许群众旁听，把审判工作交给群众来监督。”他还强调：“政法工作如果不发动群众来参加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单单依靠我们政法机关的干部，工作是做不好的。你们在工作中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与人民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

9、人民司法作风观。董老多次批评司法工作

人员孤立办案、手续繁琐、刁难群众的衙门作风，指出：“人民法院处理人民犯罪和纠纷的范围极为广泛，与人民的关系也至为密切，必须彻底克服不关心人民利益的官僚主义和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切实依法办事，实现正确审判的要求。”

他还谈到重视和及时处理人民来信来访问题，认为这可以起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并指出：“如果以官僚主义的作风处理来信、来访，则不但不能发生这种作用，反而会使当事人与当事人利害相同的其他人员同法院发生矛盾。”

10、人民司法区分观。针对一些审判人员不能正确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矛盾，结果造成脱离群众，扩大人民内部矛盾的后果，董老指出：“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首先要严格区分敌我问题和人民内部问题，对处理人民内部犯罪案件，还必须切实分析案情，认清事件是否构成犯罪，应否处刑；行为错误而不违法，或违法而非犯罪的，不能用司法手续处理；行为虽构成犯罪，但就当时和事前事后的情况全面考量，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也不应用司法手续处理，犯罪轻微的，可以不用司法手续处理”；“各级人民法院也有审判人员把某些劳动人民

犯罪案件当作单纯人民内部是非问题，片面强调教育，而不依法严肃处理。人民内部犯罪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人民内部是非问题，它在不同程度上侵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而是必须依法惩罚的问题。”

此外，董老还把培养人民群众的守法意识看作人民群众巩固自己夺得政权及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看作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基础。为此，他指出：“今天人民法院的任务除了对反革命等犯罪分子加以制裁，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民法院要通过审判活动教育群众守法。”由此可以引申出董老的人民司法基础观，却认为人民群众守法是人民司法的前提和基础，这样才能逐渐树立起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

（二）司法为民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1、国内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城市化、工业化步伐加快，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

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环境和所处的地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再次，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严重曲折，而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显露得越来越充分。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形势变化，“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基本上述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其确立为党在新时期各项工作的中心指导思想，并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重新概括和表述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司法工作也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

利益主体多元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发展，利益主体已由计划经济的一大二公转化为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

专政职能不再是人民法院的主要职能。如果说在建国初期，人民法院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话，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法院的更

多的职能是巩固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调整各种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公民的权利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公民的法律意识已有了很大提高；另一方面，公民的权利内容有了极大丰富，不再是过去仅有的家庭权益方面的内容，而是拥有包括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劳动权利等一系列的权利体系，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人民法院的裁判内容和职能范围。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于人民法院和法官而言，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要求，它要求人民法院必须发挥好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

人民法院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和法官的要求和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上述变化，促使人民法院必须以新的思想理论来指导人民司法工作，以适应新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肖扬院长在 2003 年 8 月 24 日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郑重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特征是‘立党为民，执政为民’，贯彻于人民法院的工作实际，就要牢固确立

司法为民的思想。

这是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法院工作的核心问题，是人民司法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新内容，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特征落实于法院工作提出的新的理论命题。为此，必须牢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定地结合法院各项工作实际，深入思考和研究司法为民的具体内涵，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2、国际背景。司法为民思想理论的提出，其实还存在国际司法改革的背景因素。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司法消费观念在西方国家的兴起，重新界定了司法权与社会(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迎合了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与此同时，西方现代社会对现行诉讼制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诉讼迟延、诉讼成本昂贵以及由于诉讼费用昂贵而导致司法资源利用上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上。因此，司法效率和效益已成为当前司法改革的因素和源动力。效率原则，不仅是市场经济主体及其运作方式赋予当代司法审判的历史任务，也是建立审判运行机制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取向。美国从八十年代起已经成功地将上述观念引入各级法院的审判和管理工作中。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十分强

调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的国家。

但近 20 年来，为弥补高度职业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发挥司法功能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确立了一种“回归人群，服务社会”的司法理念，并于 1997 年制定了“初审法院运作标准及评价体系”，被人称为美国“五好法院”的考核标准和方法，它集中体现了一种独立与负责并举、权威与服务并重的现代司法意识形态，使司法走入社会，走近民众，从而树立起其司法亲民的良好形象。

1991 年，英国最高司法当局发现，历史悠久的英国民事司法制度已经成为一个复杂、拖拉、昂贵、不便、无法使用的制度，惟有厉行改革方可走出困境。于是，英国最高司法长官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研究如何使诉讼当事人以及民众获得更便捷、更便宜、更全面的法律服务，使司法资源和法律资源得到最佳利用。

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该委员会的主席伍尔夫勋爵于 1996 年 7 月向大法官提交了关于英国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最后报告，这便是著名的《伍尔夫报告》。英国的“伍尔夫改革”更是从头到尾贯穿了为司法消费者服务的精神。英国的民事司法改革，从避免过多成讼，到减少诉讼的对抗性；从缩短审理

时间，到降低诉讼成本；从设置快速通道，到平衡双方当事人的财力，无不考虑到方便司法消费者，为他们创造实现权利的平等条件。

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甚至提供专门人员在法院大厅为当事人或公众服务，把诉讼文书样式或表格设计得通俗易懂，每周安排一次夜间开庭，方便公民旁听，还提供舒适的旁听坐椅，提供冷热水饮等，也无不体现了为司法消费者服务的考虑。此外，韩国、日本等国也分别将司法消费者观念导入其司法改革的内容，设计了一系列方便和服务于司法消费者的程序和措施。

在经济和法律全球化下的今天，外国司法改革的观念和动向也开始影响到中国的司法改革。2002年初，山东烟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创建“充分体现民主与文明，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服务型司法机构”的工作思路。

其司法的服务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为当事人提供优质、文明的服务。体现在司法过程中，就是要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为当事人提供方便、文明的诉讼环境，尊重当事人的人格；

二是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体现在司法

应当为社会提供公正的结果，为经济发展创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和秩序，为社会稳定运转提供润滑剂。前者为司法服务的过程，后者为司法服务的结果。

烟台法院的上述举措引起了最高法院的关注，或许为最高法院提出司法为民的思想理论起到启迪作用。

（三）司法为民思想对人民司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曾有学者结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为董必武的人民司法思想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司法战线上的具体表现，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强调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认为落实到今天的司法实践中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主要体现为：

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人民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依法保障和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人民司法工作的根本任务；

弘扬先进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人民司法工作的基本职责。

很显然，司法为民思想亦具有上述基本内涵；在这点上，它与人民司法思想是一致的，是对人民

司法思想核心内涵的继承。

但与此同时，司法为民思想在人民司法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它具体表现为肖扬院长概括的“三新”：

1、司法为民是人民法院密切联系群众的新要求。肖扬院长指出，人民法院是人民群众从事法制活动的场所，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党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渠道。

基于此，各级人民法院都必须牢固树立起群众观念，按照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要求，从制度设置到审判作风、工作作风，乃至法官的具体言行，都要体现司法为民、司法便民、司法护民的宗旨和要求。

2、司法为民是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焦点和热点问题的新实践。肖扬院长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深入推进，法院工作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各种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社会公众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和反映。群众关注、反映强烈的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司法为民的问题，反映出我们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还有很大的缺点和不足。

因此，我们要以司法为民为标准，检查和认识

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要以司法为民为宗旨，把制约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问题作为切入点，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改进不足，纠正错误；要按照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担负起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完成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3、司法为民是检验“两个效果”的新尺度。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要重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实现两个效果相统一，这是人民司法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一项重要的司法政策。那么，如何使“两个效果”相统一呢？这就要坚持以司法为民来衡量人民法院的全部司法活动，自觉地把两个效果有机统一起来，真正做到公正司法。

总之，司法为民思想在人民司法思想的基础上，赋予了其新的思想内涵和价值理念，是对人民司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法理与价值：司法为民思想确立的法理根据和价值内涵

现代法治理论认为，法是由人产生并为人服务的，法律不应异化为人的枷锁。所以，任何制度的设计与安排都应该从人性出发，与人性相结合；只

有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法律，才能获得本质上的合理性，使公众建立起对法治的信仰。因此，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国际律协《司法独立最低标准》、亚太法协《司法机关独立原则的声明》等国际文件，在阐述法院的基本职能时，都强调三点：

- 一是保护所有人平安生活；
- 二是促进实现人权；
- 三是公正适用法律。

这种表述不仅阐述了司法的性质，更重要是它阐明了司法与人、权利、社会的关系。司法为法律而存在，而法律是为人与社会而存在的。

无论是西方司法改革所倡导的司法消费者观念，还是中国的司法为民思想，都反映了这样一种倾向：当代法院已经不再满足于，把不折不扣地实施反映民意的法律作为对人民负责的惟一形式，而是试图从司法的整个过程中，从履行司法职责的方式方法以及与社会联系等方面，探求为接近司法的人们提供高质量的司法服务新途径，以明示司法机构的人民性，赢得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提高法院的公信力，并最终实现完善的法治。

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法官的司法技能最高、法

律水平最精、法律思想最深，他们或许无力评价；但他们是更有资格以一个通达之人的心态来评判法官的行为是否对人民、社会有好处，是否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自身权利的实现，是否做到了公正适用法律，是否值得信赖。这种评价是最具权威的，也是人民法院取得公信力和树立司法权威的前提和基础。

因此，司法为民思想的确立是以法理作为根据的。但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司法为民的“民”不能指具体案件的当事人，而是指所有的公民，包括犯罪嫌疑人，特别是需要接近司法救济的司法消费者群体。澳大利亚前任首席大法官布伦南爵士曾指出，法院不是“人民的法院”，而是“为人民的法院”。这一精辟阐述既体现了独立司法的工作方式，又揭示了司法工作的根本目的，也是对司法为民思想的一个有力支持。肖扬院长在谈司法为民思想时也明确指出：“人民法院依法审判的结果，当事人从自身利益角度来衡量，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满意，当事人的个人要求与法律标准难免有一些差距，人民法院的职责是依法裁判，而不应当迎合当事人的好恶。法官是在依法办案中为当事人排忧解难，促使纠纷得以解决，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稳定，促

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肖扬院长的这番讲话，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司法为民的科学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肖扬院长在上述访谈中还谈到“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与司法为民工作宗旨的关系问题，他表示“公正与效率”主题揭示了新时期人民司法活动的职责特质与内在规律，而司法为民宗旨着重揭示了新时期人民司法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总之，从法理角度来分析，司法为民思想的确立不仅具有牢固的法理基础和理论根据，而且具有丰富的价值内涵。

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司法为民思想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宪法原则。主权在民思想是卢梭的主要法律思想，它奠定了现代法治和民主宪政的基石。主权在民思想的主要内涵是：合法性的源泉、政治权力的根源是人民，而不是封建制度下的君主、贵族或任何其他团体，只有人民的意志才是唯一的法律，只有人民才有权制定法律。立法权属于人民，主权者除了立法权力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力量。在享有主权的范围内，公民是主权者的成员，是立法者；作为国家的一个成员，作为服从法律的个人，他又是法律的臣民。这

种双重关系决定了人在社会、国家及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

卢梭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其主权在民思想在资产阶级制度具有一定的虚伪性，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却具有实在的真实性。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法律是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作为司法机关，严格适用法律，公正司法，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也就是维护广大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司法为民思想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宪法原则。

2、司法为民思想体现了权力制衡的宪政理念。司法为民，而不是司法为官，这本身体现了司法权的独立性，即司法权独立于国家其他权力，如行政权与立法权；同时也体现了权力制衡的宪法理念，即公民以私权救济方式启动司法程序，通过司法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相互制衡而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从而间接地保障人民私权利不受国家公权力的侵犯。

分权制衡理论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思想。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分二为一，则将对

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分二为一，法官便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与此同时，他还认为：“一切有权力的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为了保证政治自由，防止权力滥用，他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并认为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不但要相互分立，而且要相互制约，其中司法独立是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重要支柱。虽然我国实行的是议行合一体制，但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也是分开行使的，并且依宪政原理和理论，相互之间也应是相互制衡的。司法为民思想，在理念上体现了权力制衡的宪政理论。

3、司法为民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司法为民思想倡导为民、便民、保民等一系列的司法理念，体现了司法对人本身的关怀和呵护，从而一改其过去铁面无私的冷漠表情，树立起司法为民、司法护民、司法便民的亲民形象。人文精神，一般来说，是指在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思考中，对人的主体地位、人的存在价值与世俗欲求的肯定与尊重。中西人文精神虽然都显示出“以人人为中心”的特征，但由于社会背景的不同，相互之间

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的人文精神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将个人的价值与尊严置放在“群体”利益的框架中予以考量，注重人的伦理主体意志的培植，强调个人对“群体”生存、发展的责任。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人文精神为华夏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塑造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但由于其“群体本位”深蕴着“人的依附关系”的思想底蕴，由此妨碍和制约了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发展。而西方人文精神，将人的价值追求寄寓在个性的张扬与人欲的宣泄上，提倡个性发展与思想解放，由此酝酿出文艺复兴这一近代早期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西方率先告别传统社会而步入现代化进程；但另一方面，其人文主义的负面影响，加深了西方现代化进程所不可避免的人的“物化”或“异化”的弊端，由此也引起了不少西方哲人的反省。总之，中西人文精神各有利弊。作为司法为民思想，既要注重人的伦理主体意识的培植，强调个人对“群体”生存、发展的责任；也要将人的价值追求寄寓在个性的张扬与人格的尊重上，提倡个性发展与思想解放，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完善。

4、司法为民思想体现了人民司法的最高原则。司法公正是人民司法的灵魂和生命线，也是人民司

法的最高原则。而司法公正的衡量标准，在宏观上表现为是否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中观上表现为是否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微观上表现为是否满足了公民的正当诉求和利益保护。司法为民应该是司法公正在这三个层面的辩证统一。因此，司法为民思想与司法公正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体现了人民司法的最高原则。

5、司法为民思想体现了司法权威的前提的基础。司法权威建构的基础不是法律的强制力，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法治权威的信仰。建立法治信仰的首要前提是培养公民的法治情感，进而产生对法律的归属感和依赖感，并由此激发公民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只有完成对全社会法律意识的构建，培养社会公众和广大农民的法治情感，法律才能真正体现出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才能具有至上的权威和普遍的感召力。面对普通公众培养法治情感，前提是要解决公民为什么要遵守法律。

根据现代公民守法理论的分析，培养公民守法精神中得以两个方面的条件：

- 一是公民的主体意识的具备，
- 二是法律的良法品格。司法为民思想就是将公

民置于法律的主体地位，从而有利于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法律价值理论，而这又有利于树立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司法为民思想体现了司法权威的前提和基础，即尊重公民的主体意识，培养公民的法治情感。

三、内容与措施：司法为民的思想内涵与实践表现

司法为民思想揭示了人民司法的基本宗旨和价值要求，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司法立场观。公正的立场与人民的立场在法理上是辩证统一的，因为法律意志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站在人民的立场就是站在法律公正的立场。

2、司法服务观。任何法律都有自己的服务对象，在统治阶级社会，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在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是为人民服务的。即使资产阶级的法学家洛克也认为：“法律除了为人民谋利这一最终目的之外，不应再有其他目的。”

3、司法公正观。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内在特质，是任何性质的司法都必须遵循和追求的价值目标。司法公正，正是吸引利益多元的社会公众寻求

司法救济的动因和根源，因而司法公正是司法为民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4、司法高效观。司法的效率应该是高效的，司法的结果应该是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这是司法为民思想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5、司法便民观。司法的价值功能就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司法救济服务，这种服务应该是方便、快捷的，否则，就会脱离群众而高高在上，成为一种看得见却摸不到的东西，这种东西对社会公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6、司法接近观。司法能有效地为所有人接近，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权与法治精神息息相关，因为任何实体权利的行使都离不开诉讼权的存在；如果没有诉讼权作保障的话，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许多权利都只是一张废纸。也就是说：“无救济即无权利”；或者说，“不能诉讼的法律不能称之为法律”；甚至可以说，“救济先于权利。”因此，民主社会的现代潮流是不断确认司法救济，扩大司法救济范围，而不是减少或废除司法救济；一个真正现代的司法裁判制度的基本特征（也可能是唯一的基本特征）之必然是，司法能有效地接近，而不仅仅是理论上对于的有人可以接

近。

7、司法文明观。司法是文明的产物，与野蛮、暴力是相对立的。正因为如此，司法必须以文明的精神和方式进行。在司法中，作为法院和法官应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人格与尊严，应该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的人文精神和职业操守，为社会公众树立文明的司法形象。

司法为民思想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一是在观念层面上，应将司法为民思想作为人民法院工作的基本宗旨和指导思想，作为人民法院所有司法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并由此形成司法为民、司法便民、司法护民的价值观念体系，从而丰富人民司法的思想建设内容。

二是在体制层面上，应将司法为民思想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为司法为民思想的贯彻落实提供制度保障。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建立和完善司法为民、司法便民、司法护民的各项制度和机制。

具体讲：

一要修改三大诉讼法，减少对起诉的条件限制，降低诉讼成本，扩大诉讼范围，为公民能有效接近司法提供制度保障；与此同时，设置简易、快

捷的诉讼程序和方便的诉讼机制，为公民能有效地利用司法资源提供方便。

二要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济制度，为贫困的当事人利用司法资源提供法律帮助。“只要存在深刻的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就必须设计保障诉讼当事人在法院面前至少是部分平等的特别救济措施。”

因此，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制度十分有必要，应该是司法为民思想在体制层面上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要建立和完善各项司法服务设施，为公众提供良好、舒适的诉讼环境。

三是在操作层面上，将观念上的和制度上的司法为民思想落实到具体司法行动当中，应制订和采取一系列的司法为民、司法便民和司法护法的具体措施：一是为公众设置案件受理和查询大厅。在大厅里，从接访、立案、收费到诉讼指导、查询、文书，实行“一站式”服务。为了解决当事人查询、了解案件进度和催执行的问题，应设置相应的案件查询窗口。二是实行审务公开制度，让公众了解和熟悉法院审理案件操作规程和规则，以便公众理解法院工作，并监督法院工作。三是规范法官的审判

行为。在审前，应严格禁止法官单独与一方当事人接触；在审理过程，要求法官要严格地平等待待各方当事人，不能存在任何偏见。此外，应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建设，切实解决法官审判行为失范的现象。

当庭宣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庭宣判作为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已在山东省各地法院得到大力推广。截止4月份，山东省平阴县人民法院民二庭共新收各类案件450件，其中当庭宣判的72件，当庭宣判率已达16%。当庭宣判效果如何？存在什么问题？最近，笔者对这72件案件实行当庭宣判后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一、当庭宣判的优点

1、减少诉讼成本，节省审判资源。推行当庭宣判，双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庭审笔录上签名即视为送达，减少了一些诉讼环节和程序，诉讼程序相对简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送达难”的问题，当事人不必整日奔波于法院，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而法院也因此缩短了审理周期，节约了警力。如今年六月我院公开开庭审理曹金海等8人诉刘祥海等八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当庭作

出判决，取得了良好效果。

2、法官更审慎，办案更有保障。当庭宣判要求即审即判，要在短时间内判断证据的真伪，诉辩双方控辩正确与否，法官必须更慎重、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工作积极性。通过当庭质证、认证、当庭听辩及分析说理，要当庭作出判决，减少了以往开庭后当事人试图从各方面影响法官对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将整个判决过程直接置于当事人的监督之下，保证了程序的公开，案件的质量也更高。

3、减少甚至杜绝超审限案件的发生。

许多案件如期开庭后，由于各方面原因，总是迟迟不合议，即使合议了，打印、送达裁判文书，也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案件的审理周期就被一些非正常因素拉长了，老百姓觉得下判是“遥遥无期”。从这个角度讲，“充分合议、当庭宣判”是解决某些案件久拖不决现象的有效途径。当庭宣判的推行，法官当庭表态，案件迳行判决，绝对能在审限内早早结案。

二、当庭宣判存在的问题

1、审判人员不理解，对当庭宣判持观望态度。有些审判人员不理解当庭宣判的意义，认为只要不超审限的，当庭宣判与定期宣判没什么区别，而实

际上多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是可以在合议庭之后当庭宣判的，完全不必久拖不判。有些法官则认为当庭宣判时，败诉方可能误解为事先已作出判决，情绪激动，难以接受，而定期宣判可以避免与当事人直接发生矛盾、冲突。

2、当事人支持、配合不力，对当庭宣判有阻碍。具体表现在：有些当事人举证意识不强，导致法院开庭审理时一时查不清证据、事实，无法当庭宣判。而且，当庭宣判时，合议庭在休庭后短时间内宣布判决结果，宣读长达两、三千字的判决书，有可能是事先制作好的，给当事人以“仓促下判”之嫌，当事人体会不到当庭宣判的实际好处，自然不予支持。

3、法官的业务水平和能力有待提高。当庭宣判所依赖的是法官对庭审所查明的案件事实、对原告、被告出具的证据的正确认定以及对法理的充分阐述，法官必须在几个小时内“断生死，评是非”，它要求法官必须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和逻辑思维能力。一些法官业务素质不高、当庭认证能力不强，不能从原、被告在法庭上所出示的证据中寻找证据的焦点，不能从所列证据的表象中去发掘其本质，导致的结果是庭后认证代替了当庭认证，定期宣判

代替了当庭宣判。

4、定下当庭宣判率的硬指标，不符合实际。

当庭宣判，本身不是一个衡量办案质量的标准，也不能完全体现办案效率。盲目追求当庭宣判率，给法官以沉重的心理负担，造成法官不得不应付，仅追求办案速度，而忽略了办案质量，有违当庭宣判的初衷。第

一、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是复杂和多样化的，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的很少，且当庭翻供现象的存在干扰了证据的采信，当庭宣判无从说起。

第二、开庭前就确定该案是否当庭宣判是不实际也不正常的。

三、提高当庭宣判率的对策

1、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增强当庭宣判的能力。加强考核、竞争上岗是一条重要渠道。通过每年组织几次岗位专业知识的培训、考核，现场开庭审案考核、制作法律文书考核，不但可以促进法官学习业务的紧迫感和自觉性，而且可以通过讲评分析，改正不足，提高业务水平。关于竞争上岗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要起真正竞争上岗的作用，而不再成为粉饰太平的面具，将那些有能力、有真才实学的法官选到审判岗位上来，而不是将那些有关

系、有资格而没有能力的人选审判岗位上来。

2、加强对当庭宣判的宣传，作好庭前准备工作。当庭宣判需要当事人的积极配合，要求当事人出庭应诉、在举证期限内积极举证。法院应加强对当庭宣判的宣传，让当事人充分了解、支持当庭宣判，限制举证期限、规范举证责任，向当事人发放举证须知，搞好诉前指导，提高群众参与诉讼的能力。同时法官庭前要认真阅读起诉状、答辩状和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拟写出庭提纲，查阅、熟悉相关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作好现场勘查和必要的调查工作。诉前准备工作充分有序，便于当庭查清事实、认定证据，当庭宣判才有可能实现。

3、防止走过场，真正作到“充分合议、当庭宣判”。“当庭宣判”不是目的，它所体现的应该首先是公正而不是快速。当庭宣判的真正内涵应是司法效率与公正。因此，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不能定指标，不能事先决定是否适用当庭宣判，而是经过庭审，查明事实、证据，完全可以当庭宣判时，由合议庭充分讨论后，再作当庭宣判。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举证制度的操作实施，法官应该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当事人举证不能的后果不能成为法官同情的原由，法律有情也无情，规

则面前不能搞变通，否则就没有真正的规则了，而真正损害的还是我们的社会和法律事业。

4、改革传统案件审批方式。

传统的案件审批方式，一层一层上报，由院领导签发法律文书，既加重了领导负担，又影响了审判人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办案效率低下。案件审批权“下放”，增强了合议庭的责任感和积极性，经过合议认为可以当庭宣判时，即可以由审判长决定，及时宣判，及时结案。因此，个别对改革仍犹豫不前的法院，应更新观念，为当庭宣判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可以实行案件繁简分流，相对复杂的案件按普通程序审理，事实比较简单清楚的案件按简易程序审理，使提高当庭宣判率有审判组织上的保障。

裁判文书引用法条的实务与思考

裁判文书是法官就案涉问题做出决断后，为昭示其裁决的合法性，通过一种合符逻辑的形式将其意见表达出来的载体。它是法官在案件审理中思维的一种重构和更符合逻辑的表述，是法院裁决正当化的体现。对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言，法院裁决的正当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裁判文书中引用哪些法

条、如何引用便成了大陆法系法官必备的一门司法技巧。就我国而言，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施行的“证据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不断运用，特别是第六十四条规定的法官依法独立审查证据原则，实际上是“自由心证”条款。继之后，第七十九条再次强调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也就是说，法官作出裁判的心证过程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开示。这一点，只有引用法条和对引用法条的诠释，才能达到开示法官的思维和逻辑推理过程。因此，如果说在裁判文书中引用法条是大陆法系法官的一门司法技巧，那么，如何引用和诠释引用法条便是法官的司法技能。基于这样认识，本文得以写作。

一、引用法条的司法理念

(一)从司法为民的角度讲，判决书作为司法产品应当体现司法透明的要求，而法条引用是司法透明的重要环节。最高法院今年提出要将“司法为民”落实到审判、执行的各个环节。“司法为民”看起来只是一种提法，实际上预示着我们对司法这种公共资源的认识有了新的视角——它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国家权力；但它也是社会公众需要广泛消费的一种产品或资源。司法为民更多地是从司法产品

的消费者的视角来评价和要求司法的。美国法官介绍美国近年法院管理的发展也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从公众(消费者)角度看司法和改进法院管理的趋势。所以，我们在展示法律的时候不仅是裁判的需要而且要从公众的角度考虑它的价值，以保障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地享受“司法福利”。

司法透明包括很多内容：程序透明、审判透明、裁判理由透明，甚至法官个人的相关情况资料也是公众对司法透明的要求。公众对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条文的知情自然更是司法透明的重要体现。

第一，法官尚且要凭知识和经验去发现法律，当事人和一般人缺乏发现法律的能力，法条展示对公众和当事人是一种很好的了解案件所涉法律的方法。

第二，了解法律是公众和当事人评价司法的前提和基础。裁判文书是法官、法院与公众沟通的主要桥梁。法官只有通过裁判文书才能公示自己的主观活动过程及其结论，当事人主要通过评价裁判文书来表明他(她)对诉讼活动的评价。这种评价的基础是了解法律，最直接了解涉案法律，来源于裁判文书对法条的展示。

第三，法条展示方便了当事人查阅法条，体现

了法院裁判的亲合力，拉近了人民法院与当事人间的距离。

(二)从裁判公正的角度讲，裁判结果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法条引用是这种方式实现的必要条件。司法公正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裁判公正同样应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裁判公正的展现，就是展示法条和论证法条的过程。

第一，裁判结果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就需要论证。就是要求法官按照人们的意愿对自己理解和适用法律的理由充分的展示，这是当今以及今后发展的趋势，也是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和内涵。在当今民主与法治的社会里，如果对公开获知司法裁判理由这一要求漠然处之，法官裁判的效力或许由于社会对法官意志的自觉尊重而变成了绝对权威，但司法公正的形象却难以确立。

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司法程序的产品是司法判决，一个司法判决的正当性或可合理接受性，不仅取决于判决所适用的规范本身的正当性，而且取决于作为规范适用对话的司法程序是否符合理性对话的标准和要求，如是否做到或体现诉权平等、公开审判和公布判决理由等。

方流芳更说得直接：法律解释的作用是陈述审

判理由—重要的不是法官得出什么结论，一个没有审判理由的判决被认为是司法专横的象征。孟德斯鸠提出的“自动售货机”式的审判，设想司法审判过程是一种标准三段式的机械推论过程，法律规定是大前提，案件事实是小前提，判决结果就是推理出来的结论。法官像一台生产判决的机器，一边投入法条和案件事实，一边得出判决结果。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相反，裁判文书的说理论证将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使人民司法不再是简单的权力决断，而转变为理性的论辩。

第二，法条展示是论证的大前提。成文法国家包括我国，法官适用法律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三段式推理过程，即以选择的法律规则为大前提，以查明的案件事实为小前提，然后按照一定的逻辑方法推出案件的处理结论。所以完美精彩的论证必定是在展示法条的基础上进行。例如：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是贪污罪。被告人利用原来当过局长的身份伪造文件，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单位，是否构成贪污罪。这里必须要论证。法官首先要摆出法条，这是论证的大前提。然后要分析案件事实是否符合法条里关

于这个罪的特征，关键是被告人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故意。然后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这个过程里如果不提出法条，使论证无据而变得苍白乏力。

第三，引用法条会使公众对裁判是否公正的判别更为直观。很多条款一看就明白，并不需要解释，但列出与不列出效果却完全不一样。如一个案件当事人认为法院未按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曾经达成过的调解协议内容作出判决是裁判不公，就是不知道最高法院有关于“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所作的让步不得直接作为裁判依据”这一明确的司法解释。如果裁判文书引用该司法解释，当事人一看便明白法院为什么未按最终未生效的“调解协议”作出判决的理由。

(三)从判决书本身的角度讲，司法判决必须包含最低限度的内容或要素。只有当适用的法条被充分而不只是法官断章取义地展示或者根本不展示的时候，判决书才能给人以清楚明白的感觉，从而使读者客观、全面、充分掌握法律的内涵，从而对裁判是否公正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是司法判决必须包含最低限度内容或要素的要求。所谓司法判决最低限度内容和要素是指判决书应当包含“一个受过法

律训练但不熟悉案情的人能够无需求助判决以外的材料而评估判决在法律上的正确性”所需的必要内容。

这里的“必要内容”我们认为首先就是指作为裁判依据的相关法律和具体法条全文。实际上这一点作为专业法律人的我们在查阅引用法条和未引用法条的裁判文书中感受颇深。

(四)不同价值取向的冲突与平衡。前三者的价值取向是相同的，但从诉讼效率的角度讲，在裁判文书中，在作出裁判结果之后还要用一定篇幅引用案件所适用的法律条文，必然会增加法官的“额外负担”，引用法条确实也带来了影响工作效率等问题，这就需要找到合理的平衡点。这就是需要法条引用应实用而不繁琐，适度而不泛滥。在不过分增加法官工作量的同时，兼顾司法公正、司法为民，并达到有效保障和提高裁判文书质量的目的。

二、引用法条的具体操作

(一)范围和程度。在裁判文书中引用法条全文的范围和程度应当从三个方面考虑：

——从充分性来考虑：应当保证裁判文书中适用的法律需要展示和理解的应当引用。

第一，重要的程序问题需要引用法条。从价值

取向角度考虑，凡涉及当事人重要诉讼权利和义务内容的法条应当划为引用法条的范围，如回避、缺席审判、通知当事人参加诉讼和上诉程序等。

第二，在事实认定中涉及法律规定的需要引用法条。如一份民事判决书，因为当事人双方都提供了大量证据且证明方向完全相反，法官在分析认定时对证据的内心确信和把握证明标准的法律依据作了引用。

第三，在理由阐述中涉及法律规定的需要引用法条。如一份民事判决书，法官在判决的理由阐述中对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涉及的法条进行了引用。第四，在判决主文前需要集中引用作为判决依据法条。

从必要性来考虑：以满足阅读者了解和理解法官裁判所适用的法律为限，不过量引用。第一，在涉及法律及其条文不止一个的情况下，以能够满足裁判所涉及的法律和所依据的法律得到充分展示为必要引用范围。选择引用的标准：

1、在普通法与特别法都有规定的情况下一般具体引用特别法，对普通法的一致规定可以一并阐述，如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都有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在判定合同效力时应引用合同法；

2、在上位法与下位法有冲突时应当引用上位法，如果要适用下位法，必须以合法和合理的法律解释为前提。例如民事诉讼法中法院执行仲裁的审查范围包括“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无其审查范围。

法官应本着法院执行应当只对仲裁进行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的司法理念和法理对民事诉讼法上述规定作出合理解释：法院审查仲裁“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应当指审查证据在形式上是否充足而非实质性是否充足。这样既符合司法对仲裁的监督原则，也合理解释了司法解释实际上与民事诉讼法规定是一致的，因而可以适用和引用。

第二，引用法条应当以对本案有具体的针对性为限，对众所周知的法律没有必要引用。例如合同法 205 条和 206 条关于借款人应当按约定返还借款和支付利息的规定等可以不引用；对没有具体针对性的法条也不必引用，如民法通则第 5 条关于“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等。

第三，对具体的法条规定内容比较多的，可以只引用与本案有关的款项。如担保法第 34 条规定了 6 项可以设定抵押的财产，引用法条时可以只引用本案涉及的抵押财产（如国有机器设备）的相关款项即

可。

第四，不涉及当事人重要诉权的法条可以不引用，如民事诉讼法第 149 条关于当事人上诉提出的副本的途径和数量等规定。

——从限制性来考虑：

第一，引用的法条只包括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法律、法规不相冲突的行政规章和最高法院适用法律的各种意见、批复、会议纪要以及其他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可以在事实认定和理由部分引用，以增强说服力，但不作为裁判依据引用。

第二，引用宪法属于宪法司法化问题，应当十分慎重。按照各国通行的“从近法律救济和回避宪法判断”的原则，法官判案适用法律时应当穷尽相关法律而回避宪法判断，只有当相关法律确实没有相应规定时才准予适用宪法给予救济。

根据最高法院就齐玉苓案作出的批复精神和 1988 年 10 月 14 日，最高人民法院曾就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请示的《关于雇工合同中注明“工伤概不负责任”应如何认定其效力的问题》作过批复精神，民事案件可以适用宪法规定予以救济，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引用宪法但我们认为必须要有严格的限

制和程序。

(二)引用法条的方法。引用法条的目的在于解决重要程序问题、事实认定、论证说理和作为裁判依据。针对不同的目的可以采取适当的引用方法。

——对解决重要程序问题、事实认定和理由阐述的法条引用，可以采取在文书中直接全文引用或者在文书中概述引用主要内容，同时附项引用全文的方式。至于具体采用哪种方式要视情况：

1、对法律条文单一和文字较少，在文书中全文引用不会破坏其逻辑结构的，在文书中写明法律及具体法条序号并加引号全文引用；

2、对条文较多或文字较长，全部或全文引用可能破坏文书逻辑结构的，在文书中写明法律及法条序号并就条文的主要或重要内容作概括表述，同时加括号注明“条文全文附后”字样，另在判决书尾部附上相关法律条文全文。

3、必要时要在引用法条的基础上解释法律，说理论证，不只是简单引用和堆砌法条。

——对作为裁判依据的法条引用，

1、原则上采取在理由部分的后面，裁判主文前面分别写明法律及法条序号并集中加括号注明“条文全文附后”字样，另在裁判文书尾部附相关法律

条文全文的方法。

2、对个别裁判依据单一和文字较少的，也可以采取在裁判主文前写明法律及法条序号并加引号全文引用的方法。

3、法条引用的顺序一般按照先程序法后实体法，先法律法规后司法解释的顺序进行。

(三)引用法条的解释程度。除了裁判主文前引用法条是作为裁判依据而绝对不需要解释以外，在其他部位引用法条都有对法律的展示、理解和适用问题，因而从理论上来说都有一个解释的问题。这正是法官的责任。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但是法条的具体内容不同解释的程度也不相同：对程序性法条和字面意义非常明确的法条，只要引用位置得当，几乎不需要专门的文字就能够达到解释的效果；对需要语意解释意思才明确的应当作简单精练的解释；对需要进行漏洞补充和详细分析论证后才能决定法律适用的必须详细解释和论证，如黄德志诉中国农业银行彭州支行储蓄合同纠纷案，判决书在对双方证据及其证明力作详细分析基础上才引用内心确信和证明标准的相关条款。这样才会产生法条引用的效果和说服

力。

三、实践中存在问题及思考

裁判文书是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对具体案件的实体或程序问题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书面结论。在裁判文书中引用法条，其实际意义就在于通过充分的说理将“纸面上的法律”激活为解决现实纠纷的“活法”。要将“纸面上的法律”激活为“活法”，就需要法官具备引用法条的技巧和解释法律的理论功底。由于这种愿望与现实间的差距，目前裁判文书在法条引用中便出现以下一些问题。

(一)过长法条仍在文书中引用，破坏了逻辑表达和语言结构。如一份民事判决是这样引用法条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100余字)”的规定，原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这里由于作为定语的法条过长，不仅理解难而且语言结构有问题。可以改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负举证责任的规定(条文附后)，原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再如一份行政裁定书。由于定语过长，破坏句子结构，造成病句，使人难以看懂和理解。

类似情况比较突出。相比之下，有一份民事判决书则较好地把握了在文书中直接引用法条的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反诉被告应当向反诉原告承担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

(二)过量引用法条，显得累赘。如一份行政裁定书，500余字的理由部分除了不到50个字的连接词语外，全部是法条引用，共引用了4个法条，而几乎未作任何解释，几乎就是法条的简单堆砌。

(三)引用法条和论证缺乏逻辑性。如一份民事判决书的说理部分表述为：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某条规定：“……”。不仅引用法条生硬，而且逻辑上非常混乱，在引用的100多字的法条里根本没有责任划分的内容，其为何判决被告承担主要责任难以理解。再如一份刑事判决书，先认定被告人没有自动投案自首，也没有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然后概括引用法条但并未对法律中关于自首和立功的条件进行展示和分析，接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自首和立功的规定。这里

面显然非常缺乏逻辑性。应当采取三段论的论证方法：先通过引用法条展示和解释自首和立功的法定条件，然后分析被告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其条件，再得出是否自首和立功的结论。

(四)引用法条缺乏必要的论证。德沃金指出：法律是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存在的，法律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取决于它应该是什么。那么，律师和法官为何有时会就法律产生理论性争论呢？这是由于当他们似乎在理论方面争论法律是什么时，实际上他们是在争论法律应该是什么。还有学者明确将法律解释与具体个案的裁判和法律适用联系起来进行阐述和理解，认为“在将法律或其他文件适用到具体的、实际的、需要根据法律进行判决的案件上时，就应该对这一法律或其他文件进行解释”；“要把一般的法律规定适用于具体的法律实际，往往需要对法律规范作出必要的解释”。

但大量的判决书在引用法条后还不说解释得好不好，而是基本就没有解释的过程。例如：一份民事判决书中引用了最高法院 1994 年的一个司法解释（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人承担何种保证责任的，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但却未对司法解释发布的时间和本案应当适用纠纷发生

时(95年9月13日)的法律(担保法1995年10月1日才施行,因而不适用于本案)的问题作出任何解释。由于该司法解释与现行担保法规定不一致(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责任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所以给读者形成本案适用司法解释的疑问。

总之,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制度逐步培养生长的过程。增强法官引用和解释法条的能力,把静止的法律规则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使法的实施满足人们对于自由、秩序、平等的要求,是裁判文书改革的长远目标。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引用法条的改革意义并不仅仅限于简单的形式上的法条引用问题,我们认为应当把它与法律文书应当充分说理和应当展示法官对法律的发现、理解和阐释全过程的改革结合起来,或者就是把它作为后者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样才能统一认识并更加理性和务实地推进这项改革。

对新时期法院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法院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先进法院文化对培育法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现代司

法理念和提高法院队伍整体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对人民法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培育先进法院文化，提高法院队伍整体素质，是时代的选择，是人民的呼唤。

一、准确把握法院文化的丰富内涵

法院文化的概念。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法院文化是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是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等精神财富以及与之相关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先进法院文化是法的精神本质的体现，是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和世界先进法律文化的融合，是立志献身人类正义事业的司法工作者优秀品质的积淀。

法院文化的结构。法院文化结构分为法院精神文化和法院物质文化两大部分。法院精神文化是法院在审判活动、管理教育活动中形成的独具法院特征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是法院文化中最核心的结构层次，是法院文化的源泉。它主要由法院文化中的文化思想、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司法精神、职业道德、管理哲学、行为规范等意识活动组成；法院物质文化是法院文化的物质化要素

的总和，主要由审判法庭、办公场所的建设和管理以及司法装备、相关设施等所构成的器物文化，体现了法院物质建设的文化特征。

法院文化的内容。法院文化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蕴含“公正、平等、中立、文明、高效、敬业、关怀”等丰富的内容。

公正：公平正义是司法永恒的主题，是法治文化的核心，是法院最珍贵的公众形象，是法官毕生的追求。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公正更是一种价值、一种精神、一种理想被倡导和追求。

公正的理念应该渗透到法官的骨子里、血液中，才能在任何时候都做到无私、无畏、无偏。平等：严格执行实体法和程序法，强化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对待的意识，在审判实践活动中对各类市场主体坚持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中立：作为居中裁判性的权力，审判权在法律上基本上处于中性、超然的状态。法官在解决矛盾纠纷中要保持中立，不偏不倚，惟法律马首是瞻，始终保持居中裁判地位和公正形象。文明：司法文明是一种进步，一种境界。

法院是最文明、最民主、最讲理的地方，法官干警应成为最文明的人、最高素质的人。高效：要

增强效率意识，自觉将执法活动与社会节奏相协调，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办案时限，把效率要求贯穿于立案、审判、执行等各个环节，尽量缩短办案时间，切实提高办案质量。敬业：法院是法治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是纠纷冲突的终局裁判者，司法工作维系社会安全、人民幸福，来不得半点疏忽和马虎。面对日益繁重的审判任务，如果没有对事业执著和热爱是做不到的。关怀：领导要注重情商管理艺术，发挥“情感的力量”，以情感人，尊重、理解、关心、爱护干警，要善于用伟大的事业凝聚人心，用崇高的精神鼓舞人心，用真挚的情感滋润人心，用适当的待遇吸引人心，把情商管理贯穿于法院管理的始终。

二、充分认识法院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法院工作特点要求法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综合素质，较高的综合素质是不能靠高压、强制和惩罚产生出来的，而要靠教育、靠学习、靠法官个体的自律和先进法院文化熏陶出来。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先进法院文化对提高法院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意义。

建设先进法院文化是占领法院队伍先进文化阵地的需要。先进法院文化具有导向作用，可以长期

引导法院干警跟随着法院倡导的价值观来摆正自己的位置和作出自己的行为决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社会上还存在一些带有迷信、愚昧、颓废、庸俗等色彩的落后腐朽文化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腐蚀作用。法官手中握有人民赋予的审判大权，是社会矛盾纠纷的终局裁判者，接触消极因素机会较多，在审判实践中不乏有把金钱、物质当作敲门砖去拉拢、腐蚀法官的人，如果法官不善于用先进法院文化武装自己的头脑，就极易受到落后腐朽文化的侵蚀，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

因此，必须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地用先进法院文化占领法院队伍先进文化阵地，提高干警自觉抵御落后腐朽文化侵蚀的能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构筑一道拒腐防变的“长城”。

建设先进法院文化是加强法院队伍职业道德建设的需要。先进法院文化对法院干警职业道德、行为准则具有规范和约束作用，从而促使干警放弃一些不适宜的行为习惯和利益取向，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厚德才能载法，德正方能法严。

司法公正与法官的良知密不可分，司法权威与法官的人格魅力紧密相连，而法官的良知与人格魅力又与法官的职业道德密切相关。因此，要贯彻落

实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用先进法院文化加强干警职业道德建设，把法治理念变成干警的内在觉悟和自觉行动，实现“德化于自身，德化于本质，德化于社会”。

建设先进法院文化是加强法院队伍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先进法院文化是一面旗帜，是凝聚法院干警力量的粘和剂，能够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当前，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重管轻教、重堵轻疏、重罚轻防”等问题，在各级法院还不同程度存在。培育先进法院文化，发挥文化建设所特有的统一人的意志和行为、启迪人的思维和智慧、陶冶人的心灵和情操、鼓舞人的斗志和激情的功效，无疑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法院队伍建设中存在的若干深层次问题的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建设先进法院文化是陶冶法院干警情操的需要。先进法院文化对法院干警的思想、道德修养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通过开展以建设先进法院文化为主题的活动，经常组织干警参与演讲会、歌咏比赛、文娱汇演、书画展、摄影展、征文比赛、文学沙龙等活动，使干警受到熏陶和浸润，自觉培养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注重陶冶自己情操，从而实现人格、人生境界的升华。

三、积极探索新时期法院文化建设的新途径

营造先进法院文化氛围的过程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司法公正价值观在法官群体中形成的过程。笔者认为培育先进的法院文化应着重从五个方面尝试。

围绕树立“五种精神”，着力加强法院精神文化建设。法院精神文化是法院先进文化的精髓。在法院精神文化建设中，重点要求干警自觉树立和发扬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五种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并把这“五种精神”作为法院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联系实际采取多种文化形式把法院精神文化要求贯穿于干警日常工作之中，使之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和启迪。

一是要抓好普遍教育。采取专题研讨、系统学习、专家讲座、知识竞赛、调查研究等生动活泼的文化形式，对干警进行理论灌输。

二是抓好个别教育。采取警示教育、个别批评、黄牌警告、限期整改、离岗培训等方式，使思想引导与法纪措施相结合，教育干警遵守道德规范，守住道德防线。

三是抓好教育引导。既加强对在岗时段的教育管理，又注重向业余时间延伸，引导干警模范地遵守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在单位做个好干警、在社会做个好公民、在家庭做个好成员。从而，把法院精神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增强了法院先进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围绕“机制创新”，着力加强法院管理文化建设。法院管理文化凝结了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其主要标志是培养干警群体意识和规范干警道德行为的制度化管理模式。

一方面，要善于运用文化的形式把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法院管理制度固定下来，丰富和完善法院管理文化，使其成为公正司法的机制，清正廉洁的机制，激励人才辈出的机制。具体要求是：科学、制衡、激励、稳定。科学，就是要符合司法内在的基本规律，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是否能够确保公正和效率，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制衡，就是要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在法院内部形成既分权制约，又符合效益原则，确保司法公正的法治管理模式，建立确保防止司法腐败的长效机制。激励，就是要形成一个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催人奋进的机制，

并通过机制的管理，给予每个干警公平的机会，使得每个人的能力都能得到充分发挥。稳定，就意味着不朝令夕改，意味着科学、合理，意味着成熟、完善，稳定的机制有利于建立稳定的秩序，有利于凝聚人心，公平竞争。

另一方面，要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充分发挥这些相对稳定且行之有效的制度化、管理文化的功能，使其在执法活动中既发挥硬性的法纪制约作用，又发挥软性的道德制约作用，两者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促进司法公正高效。

围绕“塑造形象”，着力加强法院行为文化建设。法官是社会的精英，不能没有文化品位。因此，要注重规范干警的仪表、言谈、举止、交往，努力培养干警符合职业要求的行为方式。

一是抓办公环境。法院审判庭、办公室、执法标志性设施、荣誉陈列室都要体现庄严、肃穆、整洁、高雅的职业特征，积极营造具有现代气息、法院特色的高品位的文化氛围；

二是抓办公秩序。要求干警从整洁穿戴、诚挚微笑、讲求时效、热心助人、客气待人等点滴小事做起，养成符合职业特点的行为习惯；三是抓办公氛围。积极创造条件，规划建设各种文化设施，适

时组织开展干警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丰富干警的文化生活，努力创造宽松和谐的人际环境；四是抓文明用语。发动和引导干警总结体现本职特点、内容简明扼要、便于记忆操作的文明用语和文明忌语，并贯彻到实践中去。

围绕构筑“人才高地”，着力加强法院学识文化建设。丰富的法学理论功底和厚实的文化底蕴是人民法院工作的基础。在大力打造学习型社会、倡导终身学习的今天，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综合素质显得尤为重要。教育培训应坚持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原则、学用一致原则、讲求实效原则，把培训目标系统化、培训工作经常化、培训内容丰富化、培训过程阶段化、培训形式多样化，使教育培训由“事业型”向“素质型”转变、“勤政型”向“善政型”转变、“感性型”向“理性型”转变、“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应命型”向“开拓型”转变，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教育干警树立充分尊重司法过程正当性和当事人主体尊严的程序意识，树立公平、效率与效益并重的价值取向，培养全球化的法律意识，努力培养高素质职业化法官群体，为建立法院“人才高地”奠定坚实的基础。

围绕“物质保障”，着力加强法院物质文化建

设。物质建设是法院的一项基础工程，是法院文化的物质载体。夯实法院物质基础，对树立法院权威，维护法律尊严具有重要作用。法院物质建设要坚持体现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便于科学管理、统筹规划、经济实用的原则。

一是抓好审判法庭的建设。审判法庭是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精神的主要窗口，是法院审判案件的法定场所。审判法庭建设要做到功能齐全、规模适中、布局规范、设施先进，在外观设计上要显示其庄重、威严为主要特色，在造型上应以“稳”为主，体现力量与威严，在外观装饰上应选用能体现庄重、威严的深色装饰材料，色调要协调，使人产生敬畏、尊崇的感情。

二是抓好办公场所的建设。办公楼是法院处理法院各项日常工作事物的场所，是法院工作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良好的办公环境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使人身心愉快。

因此，办公楼建设规模适宜、经济实用、外观庄重，尽量创造出—个美观大方、令人赏心悦目的工作环境，使法院干警心情舒畅、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同时，要增加办公科技含量，加强通讯设备、交通设备、网络设备等司法装备建设，提高工

作效率。

程序公正的价值研究

据报载，在轰动一时的微软诉讼案中，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推翻了地区法官杰克逊做出的将微软一分为二的判决，将微软垄断案发回重审，并命令由另外一名法官代替杰克逊，来担任此案的主审法官。判决说：“由于杰克逊法官同外界进行了法律不允许的接触，比如，同媒体进行秘密谈话，在法庭外公开对微软做出了许多攻击性的评论，因此给人带来一种对微软持有偏见的印象，因此我们决定撤换他，以进行补救。”

可以说，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在这次判决中并未就案件的实体进行审查，他们的判决理由即杰克逊法官的不恰当行为属于案件审理中的程序问题。与实体正义一样，程序正义是每一个法治国家严格遵守的规则。所谓程序正义，是指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如果在此过程中有违反法定程序的事实或者嫌疑，这种办案结果就不可信，应当予以撤销。

在我国，近年来，随着国家立法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司法制度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程序正义的重

要性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法律界的重视。法律程序的变革同时也引起了法律价值观的转变，一些法律新型术语也被移植与创生，本文亦试图就此抛砖引玉，做一孔管见之述。

程序公正的价值标准

一般认为，法律程序的价值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作为追求良好结果的手段，二是程序自身的德性。因此，评价某种法律程序有两条标准即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

一、结果好什么都好：程序工具主义。

现代社会，尤其是七十年代(1970年)以前，不管是在思想领域还是在行动世界都过于强调结果，而把程序纯粹看成实现实体法的“功利”的手段。边沁是这一派的鼻祖，他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应用到法律裁判的分析中，把程序法称为“附属性的法”，因为在他看来离开实体法，程序法就不复存在了。这样，在程序的有效性与整个法律的功利这个根本结果之间就可能出现不一致。如果实体法违背了功利原则，那么不折不扣的执行只能使整个法律制度更加远离功利目标。

一般的程序工具主义论者往往忽略程序法与实体法所服务的社会总体福利之间的沟壑，而从整体

上把程序法看成实现某种功利结果的制度手段。评价一种法律程序规则的好坏就是看它实现良好结果的有效性，比如，惩治犯罪不力就证明刑事审判程序差，反之就证明刑事审判程序好。

法律程序有哪些实体的价值目标呢？有人从争议解决程序角度把“结果”简单地归类为两项-----真实与正义。在一个极端，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重合，两方的争议只是认知冲突，各人的目的都是要找出对共同利益有利的解决办法；与这种认知矛盾相对的是另一个极端，当事人彼此的利益针锋相对，某种特定的解决方式会使一方的利益最大化，但却以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这里所说“真实性”与“正义”是从实体结果上而言，根据这种理论，程序规则的设计应当按照目标而定。如果目标是要获得真实性，科学的真理只能通过不断的实验才能证明，在法律程序上应当给争议程序的第三者——裁判者——更多的“决定控制权”和一定的程序控制权；如果目标是“分配正义”，最有效的程序是把过程控制权交给争议当事人。

二、意义在于过程之中：程序本位价值论

那么，结果有效性是不是法律程序作为程序的唯一价值呢？答案是否定的。比如，刑讯逼供可能

取得证据，对查明案件具有充分的“结果有效性”，但谁也不能否认非人道的程序是不可接受的。为此，必须关心程序的德性。我们认为，程序的德性包含了两个方面：

一是程序必须最大限度地理性化从而体现形式公正；

二是程序必须人道。从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出一些基本的评价标准与制度要求。从形式公正这个意义上说，以下因素是必不可缺的：

- (1)程序法治。
- (2)透明。
- (3)中立。
- (4)听取相对方意见。
- (5)合理性。

程序公正是司法权威的体现

联系人类社会法治过程不断完善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人治需要个人权威，法治则强调法律至上，而司法是法律正义的最终守护神，法律的至高无上是通过司法权威来体现的。没有司法权威，法律至上将是一句空话；没有司法权威，国家法制的统一也将遥遥无期；没有司法权威，法院的生效裁判将因为有履行条件的债务人拒绝履行而失去意

义；没有司法权威，司法裁判将弱化其平亭曲直定纷止争的功效。因而法治时代也应该是突出司法权威的时代。我们认为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是由它自身的特点决定的。

一、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

英国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但要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还有一个西方法官提出：我希望能够有效、有序地主持庭审，使其不但成为一个能够做出公正判决的法庭，同时也能让所有出庭的人感受到客观和公正。

这些表述与我们当前提出的“以公开促公正”大体是一致的，都强调了司法程序公开的重要性。通过公开，当事人（甚至全社会）可以看见在诉讼过程中法官是否严格遵守程序法的规定，是否不偏不倚保持中立，是否平等地重视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举证、质证、辩论，裁判的形成是否完全是受当事人上述努力的影响而非法外势力干预的结果，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程序是否公正的标准，这种标准是客观的，并且能被当事人感受到。

获得胜诉和获得公正对待是当事人的双重愿望，二者是完全独立的，当事人一方面都希望法官做出公正的而又合其自身利益的实体裁判，同时也

希望获得平等参与、平等影响裁判结果的机会。基于此种程序价值的理性认识，为了争取裁判过程的更大透明，甚至还有学者建议将法律推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过程及合议庭歧义法官的意见在裁判文书中载明。这样做，更利于使法庭成为胜者堂堂正正、败者明明白白的诉讼场所，更利于胜负双方对法官客观、公正、平等的裁判有更多的理解和信赖，从而达到息诉服判的效果。以前我们片面强调实体公正，轻视程序公正，就是因为忽视了当事人在追求实体公正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和艰辛，仿佛公正的结果是法官给予的，而不是当事人争取的，事实证明，法官武断给予的“公正”当事人并不领情，当前大量的上诉、申请再审案件最后在上级法院或是社会看来原审判决结果是公正的占了相当比例即为明证。

现在是该归位的时候了，否则，当事人将通过不断的上诉、申请再审来请求上级法院对他在诉讼中所作的努力给予更充分的关注，以期求得更满意的诉讼效果。现在的部分法官似乎忽视了当事人这种权利的苏醒，转而抱怨现在当事人的息诉服判工作难做，却忘了检讨其审判过程程序是否公正。

当前居高不下的上诉、申请再审而最后又得到

维持的案件很大一部分就是原审裁判“重实体轻程序”造成的，而这样的上诉申诉显然不能一概归责于当事人的无知和多事。这种结果的反复出现必然反复动摇我们本不牢固的司法权威。

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法官实体裁判有失公正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实体不公倒应该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博登海默说：正义具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这说明实体公正本身就是一种相对的公正，对同一法律现象，由于人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差异，不同的个体站在不同的角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能都有不同的评判，即使是资深法官或法学家内部同样也会存在分歧，而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作出评价的依据和标准可能又会发生变化。更何况，法院查明的事实都是证据堆砌起来的事实，还已成历史的客观事实本来面目本是一种理想，而由人收集的证据必然带有主观因素，法官对证据的分析过程就是一个对证据进行筛选、证明力排序的过程，除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外，法官对证据的分析和事实的归纳更多依靠庭审感受，这方面能力的高低与法学知识的多寡并不必然成正比。

因而，在程序公正的情况下，除非法官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据以裁判的证据是虚假或失效的，监督者一般不宜主动纠正，否则从理论上讲，这种纠正可能又会被更具慧眼的监督者纠正，“翻烧饼”式的再审将永无止期。窃以为，尽量给这样的裁判予以稳定，才是我们维护司法权威的一种积极作为。

程序公正具有客观性，实体公正具有相对性，因而程序公正具有更易于评价的优点。但我国现行的程序立法评价裁判是否公正，仍然是以实体是否公正为主要标准，程序是否公正仅供参考，具体表现为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有相似的把“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作为二审查回重审和再审立案的条件。

如果违反程序还没有达到“可能”影响实体公正的程度，现行法律承认它是公正的，也就是说，人人可见的程序不公，法律却视而不见，可见立法机关在立法当时也深受“重实体轻程序”思想影响。因而，现行程序法修改的当务之急是要正视程序公正的价值并突出程序公正的地位，加大对程序不公的惩戒，明确程序不公就是错。

二、程序公正也是一种民主且重视人权保障的公正。

在诉讼中，让当事人充分参与是非常必要的。美国“尊严价值理论”创立者杰里·马修曾以选举程序举例作了说明，他认为，一个人在选举过程中被排除在外，往往会使他作为公民的自我形象受到损害，并由此产生不公正的感觉。看来，人们参加选举实际上是在行使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权利，不论选举结果如何，这种参与本身都是有价值的。

更何况在诉讼中，那些利益或权利可能会受到裁判或诉讼结局直接影响的人，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诉讼的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其有效的影响和作用。还有学者认为充分参与“可以使纠纷当事人通过充分发言将情绪与意见在法律许可范围与方式方面予以发泄”。这种民主体现在诉讼中，就是要限制司法权的恣意和专横，充分保障当事人行使辩论权利，法官不能为所欲为地限制甚至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那些以为查清了事实就简化甚至取消辩论环节的作法都是不足取的，尽管这可能延长庭审时间而影响了效率。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权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封建传统式的为查明事实真相采用一切尽可能的手段收集证据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程序的和平性和人道性在现代法中体现得越来越充分。

程序公正，除了强调诉讼原则和程序科学、有序及严谨以外，还强调最大限度地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各项诉讼权利；而实体真实，则更侧重于通过一定的程序，最大限度地保障尽快查明案情，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利益，即控制犯罪。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禁止刑讯逼供、禁止侮辱人格或有伤风化的侦查实验等规定绝对无益于“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追究责任”，但为了保证基本人权，设置这样一些程序规定并严格遵守，牺牲一定的实体真实是必须的，相信也为人权价值苏醒的社会所理解和支持。

三、在特定条件下无法做到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就是司法公正的全部内容。

法院难免会遇到事实无法查清的案件，没有案件基本事实，则无法适用实体法，当然就无法实现实体意义上的公正。但法院定纷止争的职能又要求法院不能拒绝裁判，因而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年代，法院为追求客观真实不遗余力地利用职权积极主动地调查取证，以至于在人看来，法官更象是一方当事人的律师，法官在赢得一方当事人“父母官”美誉的同时也遭到了另一当事人的唾骂，法官

在没有平等对待当事人基础上作出的裁判自然难称公正。现在我们对法官的中立性地位有了更新的认识，而法官最好的中立方式就是消极。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出台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对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作了更严格的规定，现在正酝酿中的证据立法也将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限制，从而在法律上让法官坐到该坐的中立位置上来。显而易见，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时候，实体意义上的败诉责任早已分配给了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这时，法官只要依法在当事人之间正确地分配了举证责任，保证程序公正，他就做到了依法公正裁判，尽管他还没有查清客观真实，没有做到实体公正，但谁又能说法官裁判不公呢？

程序公正这种看得见的公正、这种民主且重视人权保障的公正、这种直接意味着裁判公正的公正，它难道还仅起保障实体公正的作用吗？当然不。如前所述，它的独立价值已经凸现，程序公正使当事人感觉在被充分尊重的诉讼氛围中“得到了他所应得”，法官裁判的过程就是当事人感受民主、客观、公平、公正的过程。这样的裁判才容易被民众所接受，这样的裁判才可能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假以时日，民众对司法的崇尚和敬仰

将慢慢复苏，司法权威将会有源头上的保障。

因而，程序公正独立且首要的价值就是在于树立司法权威，保障实体公正只是它的附随价值罢了，正如在开采石油的同时，也会采得天然气。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是刻意强调程序公正比实体公正更重要，事实上，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都有其独立的价值，二者的关系“就如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不能厚此薄彼，何况程序公正还对实体公正具有保障作用。但鉴于目前法律界对实体公正价值的论述也够充分，在此不再赘述。

对建立我国判例指导制度之思考

众所周知，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的每一期公告中登载了大量的案例，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也经常在其内部刊物上刊登一些案例，这一做法虽然没有明示是在推行判例指导制度，但实际上是起到了对法院判案的指导作用。所公布的这些典型案例直接地影响着地方各级法院对相关类似案件的处理，同时对各级法院的法官起着潜在的指导作用。由此可见判例指导制度在我国审判实践中越来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判例指导制度是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所谓判例指导制度，就是选择典型的案例判决作为判例，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借鉴和指导，今后凡有类似事实的案件，在适用法律以及裁量幅度上都可参照相关判例进行判决，以达到同样的案情有同样的处理结果，从而提升法院司法的统一性，确保审判的公正与效率。

判例的指导作用，主要是指判例中主审法官运用法学基本理论，结合基本案情对是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的反驳主张以及如何正确的适用法律所阐明的法理、道理，对办理任何其它相同或类似案情的案件所具有的指导意义。

实行判例法国家的法官在判决案件时直接引用先前对某个案件的判决依据对该案进行判决，从而避免了一模一样的官司判决结果却大不同的现象，这不仅是司法进步的标志，而且也推进了司法公正。

判例指导制度在我国某些地方法院亦开始试行，例如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法院于 2002 年 3 月份开始试行的先例判决制度，引起了国内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它是指经过筛选、审核并被法院审判委员会确认的生效判决，对本院法官在处理同类案件时具有一定的拘束力和指导作用，保证同类案件有大

体一致的裁判结果，以体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也经常在有司法刊物上发布一些判例，在民商事审判领域开始实行“判例指导制度”。事实上在我国实行的二审终审制度，上级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判决就是判例指导制度的典型例子。在传统上我国大多数下级法院和法官都有遵循上级法院判决的倾向，上级法院的判例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对下级法院所审理的相同或有类似案情的案件有着明显的指导作用和约束力，这为我国建立判例指导制度提供了经验。

中原区法院以及河南省高院的司法实践证明了判例指导制度的可行性。例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案件在中原区法院就得到了很好的审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郊的农村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当地村委会在分配收益时往往受旧的陋俗影响，使部分村民享受不到同等的待遇，此类纠纷每年都有诉至法院。这些案件涉及人员多，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但由于目前法律对村民资格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比较困难，有些法院久审不决，有的干脆中止审理，而中原区法院在审理首案时组织办案人员查阅法律文件，走访相关部门，请示上级法院，最后由

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作出了判决，该判决被确定为先例判决，供审理同类案件时参考，以后所受理的案件都因遵循该先例判决而迎刃解决，大部分都当庭宣判，极大提高了审判质量和效率。

在我国推行判例指导制度，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首先，可以规范法院的判决，促进司法统一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成文法是审理案件的重要依据。但它不可能将任何事情都规定得面面俱到，法律漏洞不可避免，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虽然是同一类型的案件，甚至一模一样的案件，而东南西北各地法院的判决结果却可能不同，甚至是大不同，有时就是同一法院所处理的同一类型的案件判决结果也不一样，这样就造成了司法混乱，不仅有损于法律的尊严和公正，而且也破坏了法制的统一。实行判例指导制度一方面法官受先例的拘束，从先例中领悟解决同类问题的思维模式和方法，使相同案情有相同的裁判；

另一方面，在遇到法律漏洞的情况下，如果先例已经确立了填补漏洞的规则，则可根据先例作出的规则作出裁判，以避免一模一样的案件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同时判例就是一份优秀的法律文书，

判例所彰显的判决书格式和说理论述的方法为其他法官在制作法律文书时所效仿，这样就规范了法院的判决书，提高了法官制作法律文书的水平。

其次，实施判例指导制度可以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

对于一些疑难复杂案件，对于一些新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在先例判决的指导下进行，法官在判案时由于有先例可供遵循，有法理可提供指导和帮助，这样就缩短了审判周期，节约了诉讼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提高了审判效率。

第三，实施判例指导制度能促使当事人主动息诉宁人。由于判例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判决，有些还是经过二审维持原判的判决，通过类比推测，未起诉的当事人可以预测到诉讼风险，促使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已起诉的当事人可以预测到判决结果，促使双方当事人自愿调解。判决之后，当事人可以预测到上诉风险，主动息诉宁人，上诉率下降，缠诉、累诉现象减少。通过对判例的认识，人们可以准确地意识到什么行为可为，什么行为不可为，法的指导作用、评价作用、预测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有利地维护社会的稳定。

第四、实施判例指导制度可以促进司法进步。

法官在审理新类型案件时，当法律对此类案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遇到法律漏洞时，法官可以在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学理论，创立填补漏洞的规则，从而弥补现行法律的空缺和遗漏，所处理的案件一旦被定为判例，就可以指导同类案件的处理，这样就发挥了法官的聪明才智，推动了司法的前进。

第五、实施判例指导制度也是我国加入 WTO 后的需要。判例法和成文法是世界上二大重要的法系，随着时代的进步，两大法系已经由原来的格格不入而转向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一方面，大陆法系已越来越重视判例的作用，利用判例的灵活性对既有的制定法进行补充和改进，在保障法律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同时也不断地引进新的法律原则和精神，以使法律在整体上能够及时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英美法系也越来越重视制定法，使法律具有形式的合理性。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在加强立法特别是制定法典的同时，绝不应当忽视判例的重要作用。现我国加入了 WTO 的现实，需要我们建立统一和完善的司法体系，实施判例指导制度，无疑会加快我国法院司法的统一性。

有人担心实施判例指导制度，可能仅会带来某

一地方法院内部的小统一，但可能造成不同管辖法院之间的冲突。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试想如果一个地方法院的司法都不统一，何来全国法院司法之统一？相反实施判例指导制度之目的就是促进和提升全国法院司法的统一性，避免不同区域内法院司法的冲突。无论是先例判决还是以后的典型判例，都不能在以后的法院判决中引用，也不能突破现行的法律法规，判例只能参照，判决必须引用成文法，同时判例决定了同类或相似案情的裁判尺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规范了，这样就避免了司法冲突。

只要在审判实践中能正确地引导，注重探索判例指导制度的规律，真正建立起我国的判例指导制度，就完全可以克服法院司法之间的冲突。

要建立我国的判例指导制度：

首先需要确认遵循先例原则。一旦将先例建立起来，则法官要受先例的拘束，使相同案件达成大体相同的裁判，法官不能随意行使自由裁量权，随意改变裁决结果。

其次应关注新旧判例的更替。当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生效实施以后，当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应及时确定发布新的判例以代

替旧的判例。

三、判例的拘束力应和我国审级制度相统一，即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判例对下级法院的判决具有最高的拘束力；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的判决具有拘束力；同一法院的判决应当对该院涉及的事实的其他判决具有拘束力；同一法院的判决对该院其他法官具有参考和指导作用。

要建立我国的判例指导制度，应采用以下方法：

一、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应制定本院的判例指导制度。在选择确定案例时一定要慎重，应当少而精，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宁缺勿滥。首先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其次对该案判决书的制作要进行认真的审核和指导，保证该判例的判决书是一份优秀的法律文书，最后要在本院内部定期公布，并可以让当事人查阅。

二、上级法院应加强对下级法院判例的指导和监督。下级法院所定的判例一定要报上级法院审核，如发现下级法院所定判例有误，应及时加以纠正。上级法院的判例一定要公布给下级法院，以便下级法院遵照参考，同时上级法院应注意避免辖区法院之间的司法冲突，统一观点，消除分歧。

三、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着手建立一个完善的判例指导制度，以指导下级法院。

首先可选择一些有条件的发达地区的法院试行，待时机成熟后推行。在实施过程中，应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判例法的优点，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和东西方的差距。

其次最高法院也可以通过公告的形式定期发布案例，并建立一个判例数据库，以便各级法院查询。

初探司法警察职业化建设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是伴随法院的诞生和审判工作的开展而产生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既是一个独立的警种，又是人民法院内部的一个部门；它既要为审判工作提供服务和保障，又要完成自己的业务工作和业务训练；既要接触案件当事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又要为法院内部其他人员服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社会各种矛盾和各种利益冲突所引起的各类案件连年增多，司法警察为审判工作服务的职能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司法警察队伍，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保障严肃执法，树立社会主义法制权威的需要，是全面加强审判工

作，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更好的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服务的需要。当前，围绕着“公正与效率”这一主题，人民法院加大改革步伐，致力于建设一支精英化、职业化的法官队伍，对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司法警察队伍职业化建设，也是法院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对于维护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和为审判工作提供优质服务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的规定，法官职业化的主要内容具体体现为“七条标准”或“七项内容”，即职业准入、职业意识、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形象、职业保障和职业监督。

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和任务是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品格高尚的法官队伍。

作为服务于审判工作的司法警察队伍，其职业化也应以上述标准为主要内容，然而，根据司法警察自身职业特点，它与法官职业化建设，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具体内容上的区别。

一、司法警察的职业准入。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第十九条规定,担任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必须是年满 18 周岁的公民,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身体健康,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自愿从事司法警察工作。曾受过刑事处罚的,曾被开除公职的,或曾被国家机关辞退的,不得担任司法警察。《条例》第二十三条还规定,根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性质、任务和特点,从其他部门调任不同职务的司法警察最高年龄,办事员、科员级不超过 25 周岁,科级不超过 35 周岁副处级不超过 45 周岁。以上是现有法律根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工作性质和任务特点等,对司法警察任用所做出的严格规定,这些规定是对司法警察队伍人员建设的重要规范保障。

当前,在一些人民法院中,尤其是在基层法院,司法警察队伍的管理机制尚不够完善,加之警力严重缺乏,法警队伍在进人方面把关不严,标准不一,致使司法警察队伍警员来源复杂,素质参差不齐,与《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所规定的司法警察任用条件严重相悖离。就目前而言,现有法警队伍存在着警员年龄偏大、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较差、业务水平有待提高的现象,这就造成了司法警察队伍在结构和质量上难以完全适应审判保障工作需

要的被动局面。

所以,人民法院应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坚持公开考试,严格考核,择优选用,对优秀复转军人、警校毕业的优秀学员和具有相关技术专长的优秀人员优先选用,杜绝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进入法警队伍,纯化司法警察的来源,优化司法警察队伍结构和人员素质,这是进行司法警察队伍职业化建设的前提。

二、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意识。

忠于职守、服务审判、公正执法是司法警察职业道德和职业意识的基本要求。司法警察是人民法院组织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地位和作用是法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所不可替代的。

因此,司法警察应当热爱这个职业,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严格职业操守。司法警察还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这就要求每个司法警察必须具备不怕艰险、勇于献身的精神。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基本职责,是为审判工作提供服务和保障,服务审判应作为法警工作的指导思想,体现在职业道德规范中,司法警察应当具有服务意识和大局观念。司法警察职业活动的主要形式,是依法执行各项警务,从事执法活动,公平和

正义应当成为司法警察职业意识的一个基本理念。

忠实于宪法和法律，维护司法机关的公正和权威，既是司法警察的职责要求，也是其职业道德和职业意识的基本要求。

三、司法警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形象。

司法警察是为法院审判工作提供辅助和保障作用的法律职业人员。从其职能角色来看，法院司法警察是一支具有武装性质的司法队伍，肩负着警卫法庭、押解人犯、送达法律文书和参与执行、协助执行等其他重要任务。由于司法警察的工作性质、工作对象和工作环境等的特殊性，其业务素质相对人民法院其他人员而言有着特殊要求。

作为人民法院重要组织力量的司法警察，面对日趋复杂的执法环境，加强正规化训练，不断提高法警业务素质，增强队伍的战斗力和战斗力，来保证顺利履行日常业务职能和应付司法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类突发事件(如对在押人犯逃窜等突发事件的防范，对群体暴力抗法事件的处置和控制等)，是保障法院审判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所在，也是司法警察职业化建设的一项巨艰任务。

但长期以来，司法警察的正规化警务训练一直是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薄弱环节，直接影

响着其队伍的战斗力，使其很难适应新时期人民法院审判保障工作对司法警察所提出的新要求。对此，一些法院虽然给予了高度关注，也曾进行过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司法警察队伍管理机制不完善、警务正规化训练的机构与设施不健全、用警与训警之间存在着矛盾等因素，尚无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因此，人民法院要切实搞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正规化警务训练，应制定关于司法警察正规化警务训练为内容的操作规范，建立专门警训机构和加强司法警察警务训练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司法警察队伍完善管理机制，优化警力资源的配置和使用，统筹解决用警与训警之间的矛盾，使司法警察正规化训练在实质上运作起来并进入良性循环。

司法警察是一种面对社会公众的职业，其执业活动反映人民法院的作风形象，也体现了司法警察自身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准。司法警察在日常警务活动中，要与案件当事人、诉讼参与人以及其他群众打交道，有时甚至会遇到一些很难处理的棘手问题。因此，司法警察在执勤中，要求做到警容严整，按照规定着装并佩戴警种、警号、警衔标志，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仪表端庄、举止文明；接待

旁听人员和来访群众时应谦虚热情、慎重处事，防止简单粗暴、推诿搪塞、敷衍了事；即使遇到一些不讲道理、不听劝阻的人和事，也要态度冷静，保持有理有节，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司法警察为审判工作提供服务和保障，必须按照司法理念和有关规定的要求，充分尊重当事人和其他参与人的诉权，并保障其人权，以维护人民法院公正、文明的形象。

四、司法警察的职业保障和职业监督。

司法警察职业保障的内涵，主要是指在职业化建设过程中，通过在法院外部、内部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保证和落实司法警察的职业权力、职业地位和职业素质，增强其职业的尊荣，保障法院审判工作顺利进行，维护国家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

这些制度体系主要保障三个方面的内容：

(1)保障司法警察的独立地位，使其能够在执行公务时依法独立履行职权。

(2)保障司法警察具有很高的职业地位，维护司法警察职业应有的尊荣，使司法警察职业具有足够的社会吸引力。

(3)保障司法警察素质的可持续提高，使这支队

伍具有恒久、稳定的专业素质和优良品质。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法院的人、财、物均受制于地方的管理和制约，从而使司法带有浓郁的地方行政色彩，由于种种因素，司法警察在执行公务，特别是在协助、参与执行的过程中，很难避免干扰。

因此，建立独立、统一的司法经费保障制度和司法人事管理制度，切实解决地方法院在财、物等方面依赖于地方行政机关的问题，从根本上避免地方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司法警察所承担的是着警卫法庭、押解人犯、参与执行、协助执行、应付突发性事件等重要任务，具有很大的风险，然而在公众的眼里，其的职业地位远不如主持正义、定断是非的法官。落实司法警察合理的职业“特权”，维护其职业权威和尊荣，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享有合理的自治“特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业行为和职业形象一起让社会公众所感知，使司法警察职业地位能够真正赢得社会的认可、羡慕和尊崇。

实行职业教育制度和严格的淘汰制度，完善管理制度，搞好正规化训练，坚持依法治警，从严治警方针，努力建设一支忠诚可靠、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有坚强战斗力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

任何权力都要受到监督，否则就有被滥用的可能，司法警察行使的职权也不例外。对法院及其工作人员监督的外部主体很多，有人大的权力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党委和行政机关的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 and 人民群众的监督，可以说社会方方面面都可以进行监督。

但是，除了权力监督和法律监督具有较为明确的程序规定外，其他监督的程序、标准、形式、内容、责任等，都缺乏具体的规定，使各种形式的不正当干预有了可乘之机，不仅损害司法的权威，也影响着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监督亟需制度化、规范化。规范对司法警察队伍的职业监督，应着眼于其职业专业性强、职业行为规范有别于其他公务人员的实际，建立确保法警依法执行公务的监督机制，使职业监督更加适合服务于审判活动的规律和特点，树立法院的威严，审判的威严，执行的威严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威严。

“春秋决狱”中的合理性与司法理念的本土化

中国历史步入战国时期，秦国采用“法家”的思想统一中国之后，法律与法制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法制成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等

级秩序、皇帝及其官僚统治与管理社会的重要工具。

但法律究竟是什么？在诸多的关于法律的解释与定义之中，《中国法律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与教育出版社共同出版）之中关于法律的论述：“在各种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可谓是一种最为奇特的精神创造，因为法律制度往往以一种最强烈的方式，集中而突出地表达一种体制，体现一种观念，作出种种要求。也就是说，法制制度作为国家实现其统治的基本工具……。”

因而，在一种法律制度中，集中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反映着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社会和人与人关系的各种看法与做法。在具体的法制制度、法律条文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思想因素。所以说，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整体折射。”

自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将儒家思想作为我国唯一的正统的文化思想之后，不仅将儒家思想之中维护尊卑秩序与等级观念的“礼”作为制订法律的重要思想；同时，董仲舒为了将儒家的思想文化彻底地贯彻于社

会之中，在审判制度上，还采取了“春秋决狱”审判制度：在审判案件时，如果法律无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的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春秋决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

尽管我国现在进行的法治建设与董仲舒时代的法制制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董仲舒时代的法制系以保障等级秩序的“礼法”为目的的；并且，相对于成文法的“律”而言，尚有高于“律”的“令”、“诏”等法律，并且“律”的最后制定着往往同样系皇帝本人，从而使得法制成为保障皇帝绝对权力的工具，同时由于皇帝本人可以随时颁布“令”“诏”等效力高于“律”而具有随意性，成为维持皇帝专制的工具。而现代我国所要建设的法治社会系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本位的，其目的是为了保障民主制度；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离，使得法律的目的旨在约束国家权力与保护公民的权利并重。随着我国法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宪法及法官法的要求，“法官上面只有法律”的法治要求将会逐步得到实现。

但是，如果抛开董仲舒的法制所要达到的目的

与现在所要建设的“法治社会”的目的上的区别，仅仅从审判制度而言，“春秋决狱”制度是否具有其合理内核呢？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之中，借鉴与学习西方的法治文化非常重要；但同时，在构建我国自身的现代司法理念的过程之中，对于我国古代社会中法制制度之中的精华予以挖掘与继承、从而实现我国司法理念本土化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封建制度能够存在两千多年，固然其中有许多的糟粕，但作为维护这种制度的“法统”能够存在于两千多年，是否其中仍有值得现代借鉴的价值呢？尤其是关于审判制度方面，我认为，由于我国古代的吏治腐败，老百姓们更多地痛恨贪官所带来的冤狱，盼望着自己能够有个“清官”而已；从大量的反映公案的戏剧以及文学作品之中，等到最终裁决的时候，案件自身已经没有人会继续关注了；而人们关注的是：官员自身是否具有贪脏的行为以及是否敢于主张正义——诉讼的结果往往更多地取决于“清官”与“脏官”之间权术的较量，案件自身仅仅成为歌颂清官或者说谩骂贪官的陪衬而已。甚至于在一些公案小说、戏剧之中，出现了当事人升官之后，由官员自身为自身雪冤或者为自己的亲戚雪冤这样奇怪的现象。比如京剧名剧《玉堂春》之

中，为苏三雪冤的竟然是她的第一位嫖客并且与她相爱至深、有过海誓山盟的王金龙，并且，王金龙与苏被拆撒的原因仅仅由于黑心的老鸨；还有，现在央视戏剧频道经常播放的越剧《何文秀》，同样地是何文秀做官之后，以官员的身份自身为自身洗刷冤屈、惩治恶霸的。我想，虽然戏剧不等于历史，但通过戏剧及其他文学作品作品可以更为深刻地反映出人们所希望出现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所希望的个案的公正只能是有个“清官”而不太关注通过何种诉讼程序之后才能够得到法官。

上述两个案件固然从个案来讲都是绝对公正的，但传统文化之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案公正所采取的方式是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呢？我想，正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之中因为官员的贪婪造成了过多的冤狱，从而使得老百姓更关注于审判的结果是否公正，而往往会忽略了对于通过什么样的审判过程进行理性的思考：法律作为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最突出的体现，其如何通过审判过程之后才能够具体地贯彻到个案之中——即如何才能够实现公正地判决呢？

我想，正是中国古代官员的冤狱太多，使得人们对于防止如何官员的擅断而出现冤枉更为关注；

而董仲舒的“春秋决狱”，由于“春秋大义”自身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确定因素，从而赋予了官员审理案件时自由裁量的权力，为法官的“擅断”提供出了法律上的依据。

我想，对于任何一种社会现象或者说制度，都必然地存在着有利的一面与不利的一面。而在诉讼制度的设计之中，同样地很难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比如，关于法律的特性，法学家萨维尼(Savigny)指出，法律的本质是一体两面，法律的理论性与实务性是不可偏废的。而法律的务实性正是通过司法程序而表现出来的；而法律的务实性不仅仅在个案之中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往往其裁决的结果还会对其他人起到规范作用，从而为法律的理论性具体到社会存在中去。记得在学习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的时候，关于程序的检测，教员说了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程序检测只能发现程序是错误的而不能证明程序是正确的；同时，即使程序运用之中有九十九次都达到了设计程序的目的，但仍然不能保证第一百次不出问题。我想，他的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电脑的设计程序；同样地，尽管法学专家与立法机关专心设计出的法律，在进入应用程序——审判适用的时候，审判人员对于此案能够

安全适用法律并不能说明法律是正确的、精确的法律。由于我国适用的系大陆法系，法官没有“立法”的职权，对于法官而言，“恶法亦法”——即对于“发现了”法律是错误的時候，其自身也没有权力对法律进行修改。

但是，从法律的务实性这个方面而言，法官在适用法律的时候，不仅仅会发现法律是错误的；同时还会发现法律的另一缺陷：法律还会是模糊的。一方面，由于法律过多而形成“法律冲突”；另一方面，由于法律就某一纠纷没有明确规定而无法直接适用。此时法官如何选择法律的适用的自由裁量权往往是必然地存在着的。同时，司法活动与法律自身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应该说是一致的；但什么是司法公正呢？美国法理学家德活金认为，“任何一个诉讼都会引起三个争论：

- 1、有关事实的争论；
- 2、法律适用的争论；
- 3、如果作出判决是合理公平的吗——道德的争论。”我觉得法律适用非常清晰的案件似乎法律就是法律；但司法制度存在相对于法律而言仍然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司法自身的价值正是在于疑难案件或者说法律规定相对模糊的案件：对于这类案件，司

法公正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犹如沃尔德的观点：对于裁判之后是否公正的，其实正是在于人们是否与人们道德的理念相符合。一个国家，为了法律关系的稳定与正义的实现，必须树立起司法的权威；而司法的权威应当包括从形式与内容。从形式上看，司法的权威来源于国家强制力；从内容上看：应当通过裁判之后，大多数的裁决能够符合人们一般意义上的道德理念吧——我指的是在法律适用比较模糊或者说疑难的案件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司法的权威从形式到内容的统一。

在古代中国，由于吏治的腐败，官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中饱私囊之后的擅断往往成为冤狱及不公正判断的主要原因；因此防止官员的擅断、限制审理案件时官员的权力往往成为在制度设计上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从而，缺少了对于“春秋决狱”之中的合理内核的挖掘。而随着我国法官职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法官职业道德成为法官职业化的一个重要的或者说是主要的因素；在法官职业道德提高到与社会的需求相适应的情况之下，应当重新审视“春秋决狱”制度之中的合理性。在“礼”作为国家的主要的统治所依据的法制的根源、同时还是社会主流的文化及价值观的情况之下，在法律没

有明文规定或者说法律适用相对模糊的情况之下，通过审理案件的官员在个案之中对于“礼”的理解而作出阐释性的解释并作为裁判的依据，不仅可以很好地将作为统治依据的“礼”具体地变成社会的存在；同时，还可以与社会的主流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观念相适应，将其裁判结果得到社会的认可从而为构建起司法机构应有的权威奠定坚实的基础。虽然现在法律与法制的基础不再是“礼”了，但现在的法律仍然具有其法理的基础即立法的本意与法律的精髓，同样需要法官在审理案件之中将之具体到个案中去。随着法官职业道德的提升，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如何能够将立法的本意或者说法律的精髓具体到个案之中去，这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含义，同时也是培养与奠定司法的权威的要求。

综上，在构建我国自己的现代司法理念的进程中，固然应当借鉴法治先进国家的经验与方法；但同时，更应当从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与理念之中挖掘及继承其合理的内核，以实现我国现代司法理念的本土化。“春秋决狱”制度就是将法律的精髓变成具体地社会存在的一种非常值得鉴定与继承的制度之一。

对案件审理周期的理解和影响案件审理周期的原因

对审理周期的理解既可理解为从立案到案件生效甚至执行的总周期，也可理解为一审、二审、再审(甚至执行)的各个分开的周期。不过，从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宏观利益的角度出发，审理周期理解为从立案到案件生效甚至执行完毕的周期更有意义；从法官和法院的角度看，目前尚没有有效的制约和协调机制，没有有关的利害关系影响，使法官和法院追求从立案到案件生效甚至执行的总周期，他们一般只是各顾各的审限，各顾各的小周期。而从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宏观利益的角度出发则不同，把审理周期理解为从立案到案件生效甚至执行的总周期并进行有关的价值追求更有意义，因为案件只一审，还有二审、再审，法律关系还未明确，还悬而不决，当事人的利益还未兑现，受侵害的权利还未得到补偿和恢复，生产和生活还不能顺利开展和进行，交易的安全和速度、效率也受影响。

另外，对审理周期的操作和管理，应理解为公正与效率兼顾，且以公正为前提和基础，不能一提审理周期，便片面理解为追求效率。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是统一和辩证的，如果片面追求效率，导致二

审和再审，反而欲速不达，不效率。2002年4月15日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有一些规定的本意是追求效率，但同时也作了兼顾公正的规定。此外，法官职业化，既有追求效率的意思，同时也是兼顾和保障公正的改革，还有，错案追究责任制等。

这些规定和制度是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因此，对审理周期的操作和管理，应理解为公正与效率兼顾，且以公正为前提和基础。

当前影响审理周期的因素有很多，审理周期一般都由法律作出规定，有的则没有规定，有的对期限规定不明确如刑事一审判决书的送达，只规定：“当庭宣告判决的，在5日内送达”，而定期宣判的，则规定：“判决宣告后应当立即送达”，“立即”是一个弹性的时间概念（一审刑事裁判文书的送达时间可能影响二审的启动时间进而影响二审周期和从立案到生效的总周期），因此，办案周期一般有明确规定，少量无明确规定，办案周期是相对固定的，关键在于操作和管理。对审理周期有影响的因素对周期的影响是双向的，既可影响使在法定周期内短时间审理完成，也可影响使在法定周期内长一点时间完成审理；另外，影响审理周期的因素是相互交

织在一起起作用的。

一、管理上的原因。

(一)“公正与效率”的主题，追求不同的价值则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强调客观真实与实体公正，则可能导致周期长一点，如果追求效率，则所用的周期短一点，如广西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件周期一般比一、二审的周期普遍长，再审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卡，担负着纠正错误与违法，维护正确裁判，维持司法公正的重任，一般院领导也较重视，其程序启动及最终判决都要经院长决定、上级法院指令、检察院抗诉和审判委员会讨论，因此，审判人员一般认真细致办理，案件本身也较疑难复杂，案件材料也较多，再审的周期一般都较长。二00三年广西钦州市中院刑事再审周期为66.5天(一审为51天，二审为37天)、民事再审周期为70.9天(一审为75.6天，二审为52.9天)、行政再审周期为98天(一审为54天，二审为38天)；二00二年刑事再审周期为87天(一审为45.5天，二审为34.4天)、民事再审周期为87.3天(一审为73.2天，二审为44.2天)、行政再审周期为89.6天(一审为71.3天，二审为40.7天)。

(二)办案经费的多少和司法成本的节约。办案

经费的多少和司法成本的节约影响到车辆、办公现代化设备、工具书、法院依职权调查的经费、成本和办案支出等因素。

(三)办公现代化水平,可供利用的现代化设备,可供参考的资料如工具书、法律法规,案例等,如果身边有足够的可供参考或可上网查,则可缩短办案时间。

(四)工作分工、人员组合、编制人数的多少,办案人员在一定时期内办案及工作数量的多少。广西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一、刑二庭,二〇〇三年工作人员比二〇〇二年少了三人,相应审判人员减少,平均个人工作量增大,审理周期一、二审分别增加了5.5天(一审二〇〇三年为51天,二〇〇二年为45.5天)和2.6天(二审二〇〇三年为37天,二〇〇二年为34.4天)。

另外,有的法院立案用电脑,合议庭成员及主办人员也由电脑排,电脑的排合议庭成员及主办人员的程序设计的思想是好的,但实际设计出来的程序在运用中却出现了某一时期连续把案件排给某审判人员,导致某一时期有人手头很多案,有人没案办,导致审判周期长。

如实行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实行法官助理制

度，在现有编制的基础上增加聘用书记员，编制不变，协助办案的人员增加了，可以使审判和办案人员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办案，提高效率，缩短周期。

另外实行主审法官制和法官助理制，搞法官职业化，目的之一便是提高效率，但实行起来为保证质量和公正，职业法官和法官助理不能太多，但不能太少。

(五)对审判人员工作人员的激励(奖惩)，如错案追究责任制，如结案率评比办案数奖励等。

错案追究责任制，使办案人员害怕被错案追究，因而追求客观真实，追求绝对正确不被改判不被再审和抗诉，追求完美，从而重调查，重证据审核，重调解，层层请示汇报，导致审理周期长。如办案数奖励，结案率评比，谁办的案多谁的奖励多，谁结案高谁排第一，肯定是追求效率与数量，尽快结案，导致周期短。

(六)领导重视，领导过问，请示汇报，领导报关，亦即行政化倾向。有的案件领导和上级、领导部门重视，亲自把关与过问，有的案件办案人员为慎重起见，按规定和惯例向领导、上级和领导部门请示汇报，使审理周期长。如审委讨论案件，有许

多一审案，符合审委讨论条件的，一般都要经审委讨论这一关，审委讨论不是随时都能开展的，要履行一定程序，符合一定条件，作一定准备，导致周期长。钦州市中级法院二 00 二年及二 00 三年一审和再审案件的周期都比二审长，一个原因便是一审和再审案件多数要经审委会讨论，而二审案件多数不需经审委讨论。

二、法律规定和制度的原因。

有的制度、规定和程序是规定死的、明确的，必须执行，如上面所举的审委讨论案件，还有如公告送达，举证期限(分别为 60 日和最少 30 天)，司法鉴定期间不计入审限等等。另，还有一些是弹性规定，如法院依职权收集调查证据，二审开不开庭、生效的裁判文书送达的期限，广西钦州市中级法院刑事二审案件维持原判的一般不开庭审理，2002 年刑事二审用了 34.4 天，2003 年用了 37 天，而开庭审理的一审案件分别是 45.5 天和 51 天，开庭审理的民事二审案件分别是 44.2 天和 52.9 天。其实法律和制度的规定在许多情况下是可以人为操作和加强管理，使周期缩短。有一些因客观原因，或为追求效率，则可在周期内尽量快一些完成，在必要时，也可在适当的时间内完成，该快就快，该

慢就慢。如二审开不开庭审理，法院依职权调查，如果为查清事实，审核分析证据和适用法律，确有必要，则可在操作上慢一点，否则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再审、抗诉，反而欲速而不达。如举证期限，最少 30 天，刑事裁判文书定期宣判的，立即送达，则应在操作上尽量快一点，否则影响审判和二审、执行。如公告送达，如果滥用公告送达，在能想方设法积极寻找当事人下落的情况下不积极寻找，则导致周期长。如果当事人确实下落不明，则可适用公告送达，周期会长一点。

三、客观原因。

(一) 执法环境不好，有许多案件受法院和司法之外的原因干扰，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受到阻碍与影响。有一些领导和部门，有一些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不高，大局观念不强，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地方和部门的利益干扰法院办案，不予配合和支持，不自动履行义务，导致法院要协调关系，汇报情况，照顾各方面的利益，甚至不敢秉公执法，不能顺利开展审理。如一些行政案件期限，国家赔偿案件，涉及政府的案件。

(二) 案件本身的原因，如重大疑难复杂、类型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公安的材料不够过硬，

当事人因力量薄弱，自身证据少，又没有力量和能力调查，证据难调查，要调查，要审查判断核实证据，认清事实，当事人下落不明，要公告送达，当事人在外地，地处偏远，案件数额大，人数多、次数多，属流窜作案，共同犯罪，团伙作案。如前面所举的例子，再审案件由于案件本身的原因均比

一、二审案件的周期长一点。

四、主观方面的原因，法官的素质、智力、能力、思想道德影响办案周期，另外人事制度改革等工作中的交换与衔接也影响审理周期。

法官的素质的影响是双向的。素质高，可能办案快，但同时，如果追求完美，在审限内尽量办得完善一点，则可能慢一点。法官的效率意识、宗旨意识、主动性积极性、责任心、能动性，工作科学性，价值观与价值追求，工作能力、智力、知识、职业道德、廉政意识等素质构成影响审理周期。广西钦州市中级法院民二庭在人均办案数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2003 年一审周期为 21.5 天，二审为 22.8 天，比全院民一民二的平均一审周期(75.6 天)和二审周期(52.9 天)少了一半以上。

再如 2002 年广西钦州市钦北区法院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一审 2002 年 12 月 31 日立案，刑事部

分 2003 年 3 月 7 日判决，刑事附带民事部分延期审理，由于附带民事被告在外地山区，于 2003 年 3 月 5 日委托外地送达民事诉状给被告，并延长审限，外地法院因找不到民事被告无法送达民事诉状，结果钦州市钦北区法院于 2003 年 5 月 17 日公告送达并于 2003 年 6 月 5 日因当事人生病裁定中止本案审理，同年九月六日，当事人痊愈后恢复审理并于 2003 年 10 月 12 日判决，判决后又因当事人下落不明于 2003 年 10 月 20 日公告送达判决书，一方当事人上诉后又再次于 2003 年 11 月 19 日公告送达上诉状，结果到 2004 年 1 月 19 日才公告期满，二审才开始立案。

2003 年钦州市中级法院某民事二审案审理期限为 170 天，原因为案件属新类型案件，案情复杂，理论上和实务中存在争议，且当事人均在外省，要调查、请示。

2001 年钦州市中级法院某民事再案审理期限为 423 天。原因为案情复杂，当事人被公安机关关押在外地，不让审判人员调查被关押的当事人，证据需要审查核实质证，另外审判人员退休，还有人事制度改革合议庭成员各散东西，导致审限一拖再拖。

2002 年钦州市中级法院某刑事二审案审理期限

为 157 天，原因为案情复杂，辩护人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检察院因人手少，工作繁忙，人事制度改革建议推迟审理，要补充侦查和请示。

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条文全文的探索与思考

一份优秀的法律文书，应当做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论证客观，说理透彻，引用法律条文准确，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文明和公正司法形象的载体。近年来，各地法院在裁判文书改革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有效的举措，裁判文书总体结构格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法官们积极尝试着在裁判文书中全面、客观地概括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主要证据，裁判说理有明显加强。但是，有的法官在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条文时，总是以一种公文语气，千篇一律地将所涉法条名称予以简单罗列，而社会大众尤其是案件当事人由于法律知识的局限性，难免产生对案件适用法律内容的“不知情”，易于造成对裁判产生异议，甚至造成对法律权威产生动摇。2003 年 6 月至 8 月，四川省高级法院指定宜宾中院和宜宾县法院、屏山县法院进行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条文全文试点，落实到裁判文书的制作上，虽然是裁判文书制作中一个局部的变化，却是法院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实质性进步，表明了法院司法水

平的提高，使审判活动更加公开化和透明化，增强了法院裁判的权威性。

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条文全文的基本内涵

(一) 引用法律条文全文的概念和特点

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条文全文是指法官在案件审理终结制作各类裁判文书时，须引明裁判所根据的法律条文全文通过以法论理的演绎，使当事人知晓裁判法律适用的情况，保障当事人的司法知情权，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继而提高法院裁判的公信力，维护法院裁判的权威性。

试点期间，四川宜宾法院共制作全文引用法律条文的法律文书 84 份，其中市中院 34 份，宜宾县法院 31 份，屏山县法院 19 份。在所制作的 84 份文书中，有刑事裁判文书 37 份，民事裁判文书 25 份，行政裁判文书 22 份。经对这些文书进行分析，归纳出以下特点：

1、采用多种类型引用法律条文。一是采用融入式引用法律条文，即将法律条文的引用融入于裁判文书的说理之中，法律条文的引用实际起到支持说理的功用，不再单独起附页引用法律条文。以融入式引用方式制作的裁判文书为 45 份，占试点文书制作总数的 53.5%。二是采用附注式引用法律条文，即

在法律文书正文之后专门加附页载明法律条文，以支持裁判结果。以附注式方式制作的裁判文书有 39 份，占试点文书制作总数的 46.5%。三是既在法律文书说理部分概括引用法律条文，又另加附页引用法律条文，这又可称为综合式，它兼具融入式和附注式两者的特点，以这种方式制作的法律文书有 23 份，占试点文书制作总数的 27.4%。

2、各类裁判文书均实行引用法律条文全文。在这次试点工作中，宜宾法院各试点单位均全面推进了法律文书引用法律条文全文试点工作，对各类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条文全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所制作文书既包括处理案件实体问题的判决书和调解书，还包括解决案件程序问题的裁定书。其中制作判决书 80 份，制作调解书 2 份，制作裁定书 2 份。无论是以一审程序结案的案件还是以二审程序结案的案件，我们均根据其不同特点在裁判文书中全文引用了法律条文。

3、引用条文涉及我国法律的各种渊源。在所引用法律条文中，既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也有行政规章，还有有关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党政文件；既有规定明确的法律条文，也有依据基本法授权性规范，由高级法院、有关部门制定的定罪量刑

标准、损害赔偿计算根据等；既有正面调整各种法律关系的条、款、项、目，也有判决主文与法律条文之间存在反面对应关系的条文引用；既有办案中必然涉及的重大程序法条文规定，如案件主管争议、指定管辖等，更有影响案件实体处理的条文引用。

4、较为充分体现了个性特点。裁判文书是审判活动的具体反映，客观上要求制作时要因案而宜。同时，既然是试点，就应鼓励各试点单位不拘泥于格式，积极探索。体现在文书制作上，引用条文程度总的根据支撑判决结果需要而定，具体由承办法官根据案件说理裁判需要灵活掌握，没有作硬性规定；对程序法、实体法、司法解释和其他行政性规章的引用顺序，原则上按说理顺序和判决顺序为依据，打破了以往先程序法后实体法、先普通法后特别法的一般惯例，甚至在同一部法律中也有颠倒引用条文顺序的现象。这不太符合法律逻辑，却实际上真正对事物发展辩证规律和案件审理先后顺序起到客观反映。

(二)引用法律条文全文的原则。引用法律条文全文，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以法论理原则。司法工作的基本要求是以事

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院裁判要做到以理服人，除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本要求外，还必须根据法律依据支持说理，促使当事人知法、懂法继而守法，严格履行法律义务。肖扬院长在 1998 年谈到裁判文书改革时提出“引用法律条文准确无误，说服力强”的要求，落实到裁判文书的制作上，就必须着眼于法律，以法论理，以法服人。针对当事人的行为，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分析论证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不合法的，哪些诉讼请求合理、哪些诉讼请求不合理。适用的法律应具有法理分析内容，在法规竞合、冲突，法律漏洞或当事人对法律本意有异议时依法理对法律的内涵予以阐释，并从法理上、法律上进行充分的论证，阐明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分清是非，明确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

2、符合辩证逻辑规律的原则。在制作裁判文书过程中，要求事实、证据、法律、裁判结果四者间形成紧密的论证逻辑联系。这就要求法官在引用法律条文全文采写裁判文书时：

一是必须将事实和法理有机结合起来，对案件所适用的法条，应予以解释，并从法理上、法律上进行充分论证，迫使其增强逻辑严密性，分清是

非，明确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是条文引用先后顺序须顺应案件发生和发展先后顺序，并兼顾判决主文罗列顺序；

三是在程序法和实体法引用顺序，不同类型法律法规和规章引用上，原则上要按照先程序后实体和法律不同效力级别的顺序进行引用；四是在引用法律条文时，一般要用动宾结构来表达。当宾语是刑法等实体法时，动词应用“触犯”；当宾语是程序法时，动词应用“根据”；当宾语是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时，动词应用“参照”。

3、引用全面的原则。引用全面包括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因为裁判文书要全面、客观地概括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主要证据，那么在裁判文书制作上就要求有针对性地全面辅之以引用法律条文全文，以求最大限度地反映审判程序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指的是引用法律条文全文应注意条文内容的完整，不能断章取义。

4、讲求实用的原则。法律价值在于它的实施，在于法律能否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否则再完备的法律也将成为一纸空文。裁判文书是对当事人双方事实争议和法律争议进行评断的书面载体。以民事案件为例，从案件当事人的身份

情况分析，绝大部分纠纷是市民之间因婚姻家庭以及乡邻相处所引起民间纠纷，也就是说，我们司法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一般市民。

法官实际处于法律制定和当事人适用法律的沟通者角色，通过对法律条文的引用，实际上是通过将共性的法律与个性的案件事实进行有机结合，对共性的法律进行展示和阐释。这就要求法官在引用法律条文全文时，基于对法律精神和市民知情权充分尊重，既要做到旁征博引、法理透彻，又要做到通俗易懂、方便操作，力求做到文风朴实、通俗易懂，不故弄玄虚。

5、注重效率原则。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追求的永恒主题，二者均需兼顾，在实现公正的前题下，必须强调效率。如果一项改革措施将较大损害审判效率，那么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在当前的裁判文书改革中，存在裁判文书向详尽方向发展趋势，但也不能绝对化，这里还存在一个效率问题。在引用法律条文全文时，并不是说通过将条文进行堆积，把文书搞得越复杂越好，而要正确把握引用程度，采取有效的引用方法，做到该繁的繁，该简的简，达到公正与效率的和谐统一。

6、保障原则。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条文全文改革

的实施，对法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对法院现代化工作水平的实际检验。要有效推行这一改革举措，必须精心组织，加强培训，为改革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同时，这项改革还将增大司法资源的投入，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信息化办公装备，客观上要求提供应有的物质保障。

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条文全文的具体问题

根据裁判文书的制作要求，根据不同案件的特点，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可行的裁判文书法律条文全文引用方法。

（一）关于条文引用位置的评断。前已述及，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条文全文有融入式、附注式和综合式三种形式，那么，在制作法律文书时究竟应如何选择适用，本文试作判断。

1、适用融入式的理由：

一是因为在裁判说理过程中，难免涉及到法律条文的引用，以支持说理，如果在文书尾部再加附页载明条文，难免会产生不必要的重复，使本来可以简化的法律文书又人为地复杂化；

二是因为法律文书的说理是说法理而不是说常理，要求将引用条文和论证很好地融合起来，因此原则上应采用融入式的引用条文全文方式。对案情

简单的案件，以及涉及共同诉讼人数众多的案件等，可以采用加附页引用条文的方式。

2、适用附注式的理由：一是因为大多数裁判文书会涉及数部法律、数条条文中甚至上十条条文，如果都在认定事实和说理部分引用法律条文全文，那么，这份裁判文书可能在形式上看起来就象是法条的照搬使用和简单堆积，使裁判文书显得繁琐，给当事人阅读理解和法官宣判带来不便，采用附注式可以避免这一问题；二是裁判文书认定事实和说理都要求精炼概括，而在裁判文书中罗列较多条文全文势必难以达到这一要求；三是因为当事人、代理人阅读裁判文书，有首先关心裁判结果，再看适用法律条文，最后才可能仔细研读裁判文书中涉及的认定事实、证据和判决理由等内容的特点，采用附注式正好方便于当事人对号入座。

3、适用综合式的理由：每一个案件都涉及明确地援引法律条文内容的问题，而适用法律的前提就是要从具体的案件事实中提炼出原则、抽象的法律规则。采用综合式，目的是避免单纯适用融入式或附注式所带来的弊端，充分发挥全文引用法律条文的功用。在这种形式下，根据案件说理的逻辑结构，在说理部分的逻辑结构中需要引用法律条文

的，则应引用。但不宜千篇一律，不引条文不影响案件逻辑结构的就不要引，此种情况下可将法条中体现的法律精神予以高度概括，之后将必须引的条文附在主文后面。如袁庆田上诉宜宾市城市规划局城市规划管理行政处罚一案，需要在判决说理部分运用《城市规划法》说明规划局享有依法对违反城市规划建设行为进行处罚的权利，但要说明这一问题将涉及《城市规划法》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五十条五个条文 600 余字的法律条文的引用，于是，该判决在说理部分对认定规划局具有行政处罚权的法律依据作了高度概括，满足了依法说理的需要，又在判决主文之后加附页全文引用了涉及的法律条文。

所以，我们认为应当采用条文融入说理为主、附注援引法律条文为补充的裁判文书全文引用法律条文全文综合引用形式，既在说理部分埋下作出判决必须的伏笔，又在判决之后辅以强大的法律条文内容予以支持。

(二)关于条文引用范围。在法学理论中，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将法律区分成若干不同的种类，例如，根本法与普通法的区分；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区分；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区分；行为规范

与裁判规范的区分；程序规范与实体规范的区分等。我国现存的制定法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军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地方规章、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等。除了现存制定法作为法律渊源的适用外，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其他法律渊源的适用问题，如政策、法律解释、不具备地方立法权的地方国家机关制订的规范性文件、社会自治规范、判例、习惯、法理等等。对于这些不同法律渊源的规范性文件在实践中的适用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颇有争论。我们认为，既然这些法律形式在司法过程中都可能被作为判决依据，那么，按照审判公开和尊重当事人知情权的要求，在具体裁判中以这些法律政策或惯例实际被作为判决根据，就应尽可能在裁判文书中全文引用或说明条文的内容。在试点工作中，对于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之外的规范性文件的引用，主要有几种情况：

- 1、引用涉及民事案件判决赔偿标准的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其范围主要是有关国家行政机关依行政职权确定的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方法和统计部门提供的有关指标。如章莉与宜宾县白花镇中心卫生院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一案，判决书中援引

了四川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关于当年本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的通知，据此确定了该案当事人争议的误工计算标准。

2、上级机关对特定事项的批复。如李永洪等与宜宾县林业局行政赔偿案，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对宜宾市人民政府的批复，宜宾县林业局对宜宾县盛产的樟油等林产品在宜宾市范围内按《四川省木材运输管理条例》实施监督管理。制作此案法律文书时，在本案的说理部分全文引用了川办函(2000)83号复函的规定，又附注引用了《四川省木材运输管理条例》关于县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对过江运载工具运输木材的情况进行检查的规定。

3、引用党政部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如王肖汉与珙县人民政府房屋确权行政纠纷案，法院引用了中共四川省委转发武胜县委《关于切实处理好城乡房屋纠纷问题》的情况报告，据此对双方争议的土改遗留房屋问题作出裁判。

4、关于经济犯罪数额标准的引用。有关经济犯罪的定罪起点和量刑标准，因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原因，依法由各高级法院制定，在实际上是根据刑法有关授权性规范作出的具体规定，按罪刑法定的原则，理当引用。但哪些当引，哪些不当引，

这是较为敏感的一个问题，现在实际上是将这些规范当成机密对待，不仅当事人难以知晓，就是法官也难以掌握，实际又导致暗箱操作的嫌疑。对这一类条文，我们认为应当区分情形，探索引用，对盗窃等经常性犯罪，可以引明具体标准；但对毒品犯罪等可能造成国际影响的定罪量刑标准，各地在确定的具体标准之外，实际还有酌情酌量的尺度，则不宜引用。

(三)关于条文引用顺序。条文引用顺序，一般的规则是按照先程序法、后实体法，先法律法规、后司法解释的顺序进行。在试点工作中，我们根据法律法规的性质和案件的不同特点，对这一一般规则有所突破，具体作法主要有：

1、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引用顺序。实体法一般是指法律、法规和规章，程序法一般是指诉讼法和散见程序法律规范。两者互为照应，互为依托，缺一不可。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裁判文书在引用实体法的同时，也必须引用程序法。

对于案件主管、管辖等审理案件发生根据的程序性规定，必须先行引用，而且应置于案件事实叙述部分之前。如宜宾中院指定宜宾县法院管辖的陈会明诉高县人民政府不服辞退临时人员一案，该案

判决书在列明当事人情况之后，即引用《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说明上级法院将案件指定其管辖及其据此受理该案的根据。对于一般性程序条文，如二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选择裁判方式的条文，则可在引用实体法之后再引用，这样可更好地满足当事人关注案件的实体处理结果的程度高于关注程序问题程度的要求。

2、说理顺序决定条文引用顺序。这是融入式裁判文书应当采用的条文引用顺序。加强说理是裁判文书制作的要求之一，说理过程就是围绕争议焦点，针对案件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分析认定的过程，那么法律条文全文引用顺序就应当与说理顺序相一致。一般的说，说理是根据案件争议焦点排列顺序进行的，那么相关条文引用也应按照争议焦点排列顺序进行，将条文引用与论证很好结合起来。按所引条文效力高低决定引用顺序，效力高的先引用，效力低的后引用。

3、判决顺序决定引用顺序。在以附注方式引用的文书中，如果严格按照法条效力高低引用，在法条排列顺序上可能显得较为规范，但在这种引用方式中判决顺序与条文引用顺序将互不一致，而同一

案件的判决可能涉及多部法律和同一部法律的若干条文，按此方式执行极可能造成裁判对象阅读文书时的思维障碍，既不便于操作，也不便于当事人理解。因此，我们建议在以附注援引法律条文的裁判文书中按判决结论顺序引用实体和程序法律，对同一事实点涉及条文的说明，既可先引用法律法规，又可先引用司法解释或相关程序法，这是一种综合引用的方式，有利于为判决结果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

4、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条文引用顺序。刑事或者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虽附带于刑事和行政案件同时审判，但其本质上仍是一种民事诉讼，涉及民事裁判部分的条文应当引用。在制作附带民事判决书时，将会遇到刑法条文与民法条文或行政法规与民法条文共同引用的顺序问题。对于此种裁判文书中民法条文的引用，应在刑法条文或行政法规引用完毕之后再行引用，以与此类案件审理时先审判刑事或行政部分再进行民事部分审判的审理顺序相一致。

(四)关于全文引用程度问题。法律条文全文引用到什么程度为适当，这是法官在采写法律文书时较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条文的引用应以

能够支撑判决结果为限，不宜过于简单，也不宜过度引用。以能够支撑判决为限，这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决定权和选择权在法官本人，属于法官自由酌量的范畴。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由裁量与心证公开程度决定法条引用程度。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分析认定实际是自由心证的过程，形成心证的过程应在庭审过程和文书载体中公开，法律条文引用起着支持心证公开，说服当事人的作用，因此法律条文引用程度应以心证公开要求程度为限。把握全文引用法律条文的满足度，要注意以下几点：

1、引用条文与事实认定和判决结果要有关联性。法律条文只是法律适用“三段论”中的大前提，即适用法律须通过说理分析说明案件事实符合该法律条文，然后根据该法律条文才能得出结论。法律文书的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与判决结果之间须有紧密的联系并通过逻辑推理的形式表述出来。

2、引用法律要有针对性。全文引用不是全部引用，即引用条文内容所及外延小于本案的法律事实。在裁判文书中，从法院立案到判决结果的每一诉讼环节均应有所体现，而法律条文的全文引用则仅针对其中支撑判决的事实和说理以及判决结论进行，而其他可引不可引的条文则不宜引用。

3、条文要具有准确性。条文应引用到条、款、项，注意引用的准确性和全面性，防止断章取义。如具体案件涉及法律条文过多过杂的情况，也可按项、条、款的满足度要求适当选择引用，辅以必要的文字概括说明。在具体引用时，要做到精当、扼要，防止多引、错引、漏引现象。

4、二审裁判文书条文引用程度小于一审文书引用程度。二审审理的重点与一审案件的审理重点应有所不同，二审主要围绕上诉请求、争议焦点及新的举证、质证来进行，且双方当事人手中都持有一审裁判文书，故没有必要将一审已引用的法律条文内容全文转抄。在二审裁判文书中，应当考虑补缺，一审裁判文书缺什么，二审就应当补上什么，并围绕上诉请求、争议焦点和二审确认的案件事实加强对法律条文的表述。

5、简易程序和调解结案案件的条文引用要灵活处理。大量的以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和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协议的案件无需引用法律条文。但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并非等于简单案件，对当事人争议较大、法律关系复杂的一些案件也应引用法条全文。应当注意避免在简易程序和调解结案案件中一律引用条文全文，将本可简单的程序人为复杂化的作

法。

6、论理中引用法条与裁判中引用法条的平衡。论理中引用法条是为了阐释法理，辨析是非，明确责任，以理服人。裁判中引用法条是为了给裁判结果和裁判方式提供依据。前者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引用的法条进行全文引用或作一定的阐释和论证，后者只引用原文即可。论理中已引用的法条如果在裁判中还需引用的，可不必再引用原文，只引用条、款、项等即可，避免重复引用而拉长篇幅。

(五)关于各类审判裁判文书法律条文全文引用。相对于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目前我国人民法院有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审判。在全文引用工作中，须体现各类审判的不同特点。

1、刑事审判中法律条文引用。在刑事审判中，适用法律规范形式主要是刑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等法律规范，形式比较单一，因为除刑法外，其他法律以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都不得规定刑罚的内容，一般不存在适用其他法律以及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的问题。在刑事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条文全文时，要注意结合案情，运用刑法理论对法律条文进行阐述。因为，从我国刑法分则条文对罪

状的规定来看，有很多条文对罪状的描述都是简单罪状和空白罪状，只有犯罪名称，没有具体描述犯罪的构成特征。如《刑法》第 232 条中的“故意杀人的”、第 233 条的“过失致人死亡的”、第 240 条中的“拐卖妇女、儿童的”等。对于简单罪状和空白罪状法律条文，在判决理由部分仅进行全文表述尚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还必须针对案情特点，对犯罪构成理论和其他刑法理论在案件中的适用作深入浅出的论述，才会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2、行政审判中法律条文引用。行政审判的特点是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主要形式是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而且大量的是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在适用程序上，启动行政诉讼的前提条件是因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而提起，行政审判不适用调解等。行政审判引用法律条文在引用文书类型上为判决书和裁定书两类。在具体引用中，应做到：

一是在一审行政判决中除适用实体法的有关条款外，还要引用《行政诉讼法》第 54 条关于判决根据的法律规定；

二是在引用行政规章时，应当写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 53 条，参照某某规章(条、款、项)的规定”；

三是对于其他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在裁判文书中也应引用，明示其具体内容；

四是法官在具体案件中一般不涉及对规范性文件引用和作出判断的问题，但如对依照该规范性文件就具体行政行为审查中，出现规范性文件相互矛盾或与法律法规、规章产生矛盾时，则须对该规范性文件作引用并作出判断。

3、民事审判中法律条文引用。民事审判面向的是全方位的社会和商业交往，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十分繁纷复杂，因而在适用法律上涉及面广、难度较大。而且民事审判中的商事审判适用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约定、惯例及前例对于法律适用有直接影响。

在是否适用类推问题上与刑事审判也有明显的区别。据此，法官要针对各项审判工作的不同特点，研究其法律适用问题。要处理好民法基本原则条款引用和具体权利义务条款引用的关系，能够引用具体权利确认和责任分担条款的，则仅引用该具体条款，不引基本原则；民商事案件的相关法律规定往往较为笼统，依据法律的精神和基本原则来处理案件，对这类案件则不宜将条文附后，否则对法律掌握程度不高的当事人来说，反而可能引发对案

件处理依据正确性的猜疑。

对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条文全文改革的评价

(一)积极评价。通过为期三个月的裁判文书全文引用法律条文试点，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1、司法公信力明显提高。将案件适用法律条文全文引用的裁判文书送达当事人，为法官带来了向社会展示其雄辩论证的宝贵机会，也使群众因此接受了生动具体的法律教育。在这种形式下，既可以使当事人直接阅读到法律条文，变“心中无数”为“心中有数”，促使其服判息诉，又能改变当事人由过去的凭直觉衡量判决结论，无端怀疑判决的公正性的情况，提高了裁判文书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屏山县法院在试点期间共制作 19 份裁判文书，无一件上诉或申诉，服判率高达 100%。无独有偶，宜宾县法院以全文引用方式审结的民事案件，至今也无一件上诉或申诉。这或许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难排除偶然中蕴涵必然的因素。事实上，引用法律条文全文的裁判文书，起到了宣传法治、定纷止争的良好效果，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如屏山县法院审结的被告人喻家先非法行医案，审理期间被告人情绪激动，扬言要上访，法院将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8000 元的全

文引用刑法第 336 条第一款的判决书送达被告人，被告人及其家属看到该条文关于“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规定后，立即表示服从判决，愿意按判决执行。再如宜宾县法院审结的一起因高速运输工具致人损害赔偿案，被告方坚持认为其无过错，不承认向受损方承担赔偿责任，当法院将引明《民法通则》关于无过错责任的条款后，被告终于明白了无过错也要承担民事责任的道理，随即表示服判息诉。试点期间，宜宾全市法院各项工作顺利推进，没有因试点工作而降低审判效率。1-8 月，宜宾全市法院结案率达 77%，较去年稳步上升。宜宾县法院、屏山县法院以全文引用方式审结的各类案件，无一件超期审结的案件。

2、有力地推动了审判方式改革。我国以公正和效率为价值取向的审判方式改革，无论是在民事纠纷还是在刑事诉讼中，都确定了抗辩式的诉讼方式，突出了诉讼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这实际是由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走向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过渡，从审判机关内部决策形成过程的“暗箱操作”走向了尊重当事人知情权的“阳光工程”。法院裁判文书又称之为司法公正的载体，这一诉讼模式的进

步也为裁判文书的改革带来新任务，即通过裁判文书公开开庭审理、合议评析、认定证据和适用法律的全过程，反映法官在审判案件过程中运用审判权的公正性。一份叙事清楚、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无懈可击的裁判文书是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体现。通过实施全文引用法律条文改革，使得裁判文书成为依法论理、适用法律透明的继而证明裁判结果公正及程序合法的个案论证文。从这一意义上说，引用法律条文全文方式制作的裁判文书，集中反映了审判方式的改革成果，并有力促进了审判方式改革。

3、裁判文书制作水平得以提高。近年来，法官们已着手探索反映审判方式改革成果的新的裁判文书制作模式，出现了一些说理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的优秀裁判文书。但是从整体上看，裁判文书大多还是一种公文写作模式，法官适用法律做出判断的思维过程被省略，导致叙述事实主观片面，缺少法理分析，缺乏说服力。甚至有的法官对不同效力级别的法律适用规则不了解，或对法律条文内容理解偏差，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通过全文引用法律条文，以法为据对事实、说理和判决结论作出严密的逻辑推理，有利于客观公正评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

请求和证据。在此情况下，法官实际处于法律规范与具体适用法律的操纵者的地位，其地位的重要性使得法官不得不增强工作责任心，进而尽心尽力地努力写好每一份法律文书。同时，法官既是适用法律的运用者，又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受到法律的约束，促使其在运用法律推理裁判时，要尽可能地做到自圆其说，否则，法官将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不利评价。经检查试点期间制作的全文引用法律条文的裁判文书，无论是在制作形式还是说理技巧等诸多方面，较之过去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4、促进法官实现职业要求。裁判文书是对审判全过程的动态反映，全文引用法律条文制作裁判文书，使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裁量的行为受到法律规则的制约，表现在法律文书制作上就是法官应书面公布其酌量的法律依据。审判工作是一种实践性和经验性都很强的工作，法律条文全文引用对法官提出较高的职守要求，它要求法官在裁判文书制作时，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和证据上的见解，要运用法律具体内容予以阐明，通过严密的思维将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巧妙结合起来，熟练地运用法律规则解决各类纠纷，还要注意对于法律规范的合理性涵义的推敲和综合操作，留心于法条之后的共同规则和

指导原理。通过全文引用法律条文对法官提出的这种较高执业要求，有利于法官加强学习，潜心研究，提高业务素质，进而提高裁判质量。

(二)消极评价。试点期间，也发现了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条文全文改革存在的一些问题。

1、法律制定的不统一为全文引用带来难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法治进程不断加快，与之伴随的是制定法的数量日益增多，并且制定法的总类也不断增多，表现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军事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种形式，还有政策、法律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适用等。可以说，从上至下，各行各业，都在制定能够影响法院司法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有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互间存在矛盾和冲突，需要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予以合理解释和造法，这种法律制定的不统一现象客观上为法官适用法律带来难度。

2、各地因理解不同而作法各异。在我市各基层法院，其经济状况、人员结构、审判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反映在全文引用的改革上来，出现发展不平衡现象。又由于没有一个从上至下的全文引用法律条文操作规范，各院是根据其理解探索全文引用的方法，必然会出现作法各异现象。

3、当前法官业务素质与全文引用改革要求尚不完全适应。近年来，各地法院通过引进人才和加强法官在职学历教育和业务培训，使得法官素质有了一定提高。

但是，我国法院法官来源复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现有法官多属于经验型法官，与专家型法官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就以法官职业化改革而言，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全文引用法律条文的实施，要求法官有较高的法学理论素养、审判专业素质和逻辑思维能力，就当前我国法院法官素质而言，和这一要求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4、司法资源投入增大。全文引用改革的实施，增大了法官在某一案件中的单位工作量，要求投入更大的人力完成这项工作。

同时，这项改革还要求法院有一定的资金和物资投入，要有信息化办公设备作保障。上述两方面在人力和物力上的司法资源投入增大，给法院提出了更大的保障要求。

总的来看，裁判文书全文引用法律条文改革在服务对象上尊重了当事人的司法知情权，在法院内部有利于促进审判方式改革特别是裁判文书制作水

平的提高，有利于培养锻炼高素质法官，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度和司法权威。虽然这项改革还存在许多不成熟之处，但利弊两者相较，客观地说，利大于弊，积极因素远远大于消极因素，这项改革是有极大价值和极强生命力的，我们对此持肯定态度。在下一步的此项改革工作中，建议尽快研究制定出相应的工作规范，引导法官正确制作全文引用法律条文的裁判文书；要通过召开研讨会、培训会等形式，促进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条文全文水平的整体提高；要通过不断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提高法官素质，适应改革的要求；还要通过加大司法资源投入，为裁判文书全文引用法律条文改革提供更加有效的物质保障。

当前送达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送达工作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诉讼目的的重要保证。《民事诉讼法》第70条至84条对送达作了专门规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法院改革的现实状况，送达工作存在很多问题，亟需完善，以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

一、送达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些送达形式难以实施。例如第79条规定，受送达人或同住成年家属

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但在实践中很难做到，留置送达邀请第三人到场，取决第三人配合程度及能否找到第三人。被送达人所在单位或组织由于法律意识不强，对司法机关存在抵触情绪，以法律无明文规定其有义务协助送达为由而拒不配合。况且，实行大立案改革后，所有的诉讼文书都由立案庭统一送达，立案庭既要送达，又要立案，在此情况下，要求在每一个受送达人拒收时都邀请第三人，时间是不允许的。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由两名送达人员在送达回证上面签名，说明拒收的情况。

第 80 条规定对于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但现实却是部分法院出于局部利益、地方利益的考虑，很少主动配合，对于委托送达的诉讼文书不积极送达，无故推托；有时委托异地法院十分方便的送达，而受理案件的法院不得不驱车几百里进行送达。

邮寄送达的过程中，邮局仅仅将法律文书交给被送达人所在工作单位、基层组织，由这些单位签收后，再转交当事人。由于种种原因，有时法律文书几经周转才达到被送达人手中，造成邮局回执上记载的日期与当事人实际收到的日期不符。由于邮

局并无留置送达的权利，当事人拒绝接受时，邮局不得不将法律文书退还原单位，即人民法院，这在客观上延长了送达时间。

(二)送达效率低。人民法院送达法律文书，大部分都在工作时间内送达，由于当事人外出上班、做生意等原因，很难找到。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送达一般在被送达人的住所、居所进行，在送达地点的选择上，送达人选择的余地很小。送达签收过程中，签收人范围小，受送达人本人不在的，只能交给与其同住的成年家属，受送达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只能交给该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等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当庭宣判后，当事人对诉讼结果早已心知肚明，败诉的一方当事人有时会自然失踪，找不着被送达人。法律对送达地点、签收人范围的规定以及城市的地址编制不科学、地址易名或者签发的诉讼文书中受送达人地址不清，当事人关系不明等给送达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使送达效率十分低。有时为了送达一份诉讼文书，送达人往返寻找了好几次，花费了好多时间但还不能送达。

(三)送达不规范，个别情况下，对是否送达及

送达效力存在争议。由于个别送达人员认为送达既不处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又不处分其程序权利，对送达工作有一定的轻视心理，认识不到送达的重要性，在送达法律文书时不注明代收人与受送达人的关系、留置送达不注明原因等现象。他人代收邮寄的送达文书时，邮递员一般不注明签收人与收件人的关系，这些直接影响到送达的效力，甚至给审判工作带来被动。

以上简要分析了送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此，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正：

二、送达工作的改革措施：

1、修改《民事诉讼法》的相关内容。删除第70条中关于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的代表在场的规定，改为受送达人拒绝接受诉讼文书的，受送达人应在送达回证上注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对于第80条，应添加受托人民法院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送给受送达人，不能送达的应立即告知委托法院。赋予邮政机关的送达人地位，只要邮政机关是在寄送法律文书，应享有《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送达时的权利，承担同等义务。但邮政机关不再适用邮寄送达、公告送达、委托送达等规定。

在未修改法律之前，对于在送达中当事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进行留置送达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录音录像，客观准确地记录下送达的全过程，并由送达人员说明情况后，在送达回证上面签名。对于委托送达的，由上级法院对法院之间的委托进行规范，加强对受托法院的监督管理，对于邮寄送达的，应当加强管理，要求其直接将法律文书交给被送达人及其同住成年家属、法人及其他组织负责收件人，将这作为应急措施。

2、借鉴国外立法的规定，在送达时间、地点的选择上给送达人更多的选择权，扩大送达人的范围，确立当庭宣判视为送达制度。

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103 条规定，送达应在被送达人的住所、居所、营业所或事务所进行。德国、法国等国家还规定了随时送达制度，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只要看见被送达人，就可向其送达。我国应借鉴这些规定，在送达地点的选择上，不应拘泥于被送达人住所地、居所地，而应给予送达人员更多的选择，例如可在工作单位送达、在看见被送达人的地点送达。在送达时间的选择上，以在工作时间内送达为主，工作时间内，被送达人外出，可利用作息时间进行送达。

美国对送达签收人的规定是送给本人住所“适龄适智”的人、经授权的人、受雇人员。我国也规定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进行与其智力相适应的活动，已满 16 周岁但不满 18 周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后者当然可以进行任何民事活动，前者也可进行部分民事活动。因此，送达时，不应局限于《民事诉讼法》第 79 条“同住成年家属”的规定，对于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的，可以向已满 16 周岁但不满 18 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以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送达，只要其智力水平达到相当阶段，就可以让其负责收件；对于法人及其他组织，可以向其任何工作人员、受雇人员送达。

从送达的目的上来说，送达是告诉受送达人一定的事项，让其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当庭宣判后，只要当事人到庭，其已知道法律文书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庭宣判与送达具有相同的效果。因此，当庭宣判后，当事人自然失踪的，可以不必送达，但应将失踪状况记录在卷。

3、对送达工作要足够重视，注意研究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组织送达人员进行学习、探讨、改进工作思路和方法。跟法院送达人员、邮政部门及其工

作人员讲明情况，增强其责任心，要求其在寄送法律文书时，按要求去寄送。

4、发挥原告协助送达的作用。原告在起诉时，可以让原告写清被告、第三人、证人的住址、工作单位、家庭电话、手机、BP 机等，以便送达人员联系，送达法律文书时，经过查找，仍无法送达的，除公告送达外，还可告知原告，让其协助法院送达。